

第14卷 第4期 2021年12月

(本期译自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Number 107, Autumn 2021,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 主办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第 14 卷第 4 期 2021 年 12 月

Vol. 14, No. 4, December, 2021

国际高等教育

全球议题

家族大学：21 世纪的最佳选择？	1
新《欧洲大学宪章》	4
免费高等教育：在政治浪潮中随波逐流	6
学术界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高等教育排名（研究）的矛盾状态	8

关注中国

与中国的交流：高等教育的困境	11
“内卷化”冲击下的中国学术职业	14
回顾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辉煌历史	17

关注非洲

非洲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与质量保障	19
新冠疫情如何影响非洲国家的高等教育和研究？	22

欧洲发展

欧洲高等教育：回顾与展望	25
法国在高等教育中更上一层楼的四种方式	27
苏格兰品质：苏格兰高等教育的独特之处	30
孤独的天才还是群体的智慧：关于德国赞助独立研究机构的迷思	33

学生研究

STEM 领域学生的跨国学习	36
评估学生体验	38

国家/地区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完美风暴”？	40
政变下缅甸高等教育的悲剧	43
新冠疫情时代日本大学的国际化	45
印度：太多的印度理工学院，不切实际的期望	47

本期翻译自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第 107 期，文中所有观点仅代表作者意见。

家族大学：21 世纪的最佳选择？

爱德华·崔、菲利普·G·阿尔特巴赫、汉斯·德·维特、马特·艾伦

爱德华·崔 (Edward Cho): 韩国延世大学讲师,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博士

电子邮件: eddie.chae@gmail.com

菲利普·G·阿特巴赫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研究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汉斯·德·维特 (Hans de Wit):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名誉教授

电子邮箱: dewitj@bc.edu

马特·艾伦 (Matt R. Alle): 美国巴布森学院 (Babson College) 创业部副教授、家庭创业研究所所长、全球成功跨代创业实践 (the Global Successful Transgener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s) 项目学术主任

电子邮件: mallen4@babson.edu

尽管家族所有 (family-owned) 或由家族管理 (family-managed) 的大学全球地位不可小觑, 但却几乎被人们遗忘。家族大学存在于各大洲, 多达数千所。家族大学由家族建立, 通常是由一位具有领袖气质的家族成员创立, 数代以来, 一直由家族管理。尽管没有数据表明家族大学的经营范围之广, 但据估计, 家族大学在一些国家的大型私立高等教育部门仍有显著的影响。本文的分析基于《家族所有或家族管理大学的全球现象》(The Global Phenomenon of Family-Owned or -Managed Universities, 2020) 一书的成果, 菲利普·G·阿尔特巴赫、该书由爱德华·崔、马特·艾伦及汉斯·德·维特编著。

家族大学可能与一般的大学有几个差异, 主要是以家族为主的领导层制定组织决策的方式以及因家族成员介入管理后带来的独特机遇与挑战。在大多数国家, 家族联盟

可被视为是为了得到其创立大学的所有权。很多情况下, 家族的教育集团涵盖其他机构种类, 比如中小学等。

机构特点

在私立教育领域中, 家族大学拥有非家族大学的一些典型特点。例如, 家族大学以营利与非营利性共存。在孟加拉、哥伦比亚、印度、日本和韩国等国中可见非营利家族大学, 这些国家的政策禁止在高等教育领域从事商业活动。与此相比, 亚美尼亚、巴西、中国、埃塞俄比亚和菲律宾等国的情形迥然不同, 在这些国家中家族大学可以将商业兴趣与社会责任相融合。

在机构自治方面, 家族大学与私立非家族大学的自治管理有相似之处, 其自治程度因国家背景而异。对公立和私立部门政府监督没有实质性差别的国家里, 家族大学的自

主权较少。这些国家包括亚美尼亚、中国、日本、菲律宾和韩国。在这些国家，家族大学可能被视作准公共实体，并且大学事物管理方面也受到政府的规范管理。然而，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并非如此。巴西、埃塞俄比亚、印度和墨西哥等国政府对大学实施相对宽松的监管。

家族大学与私立非家族大学其他类似的方面包括：机构优先事项和社会角色，招生能力，学术课程、焦点与研究，教育质量，以及融资模式等。

“家族性” 维度

所有的家族大学都保留了学术机构的性质，但各大学的程度不同。然而，与私立非家族大学不同，家族大学与家族企业更具有相似性。像家族企业一样，家族大学拥有社会情感财富（socioemotional wealth），这类财富也可被视作为一个组织的非金融捐赠存量。社会情感财富包括家庭和大学之间的共同身份、有约束力的社会联系或关系资本，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依恋等。基于忠诚、互惠和信任的强大社会纽带塑造了一种参与式的、类家庭的文化，其中家庭和非家庭成员都有成员资格。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依附也可能从中被发现，如骄傲和爱等积极情感，以及失望、沮丧或愤怒等消极情感。

社会情感财富还包括家庭影响和延续，或家庭为基础的继承。这些形式的资本通常在组织决策中得到保护和发展。根据新员工任命和晋升的决策就是此类资本的一个例子。通常情况下，家庭更喜欢选择亲属而不是更符合条件的非亲属人员。在某些强调此类决策的家族大学中，家族在董事会层面仍然占有主导权，通过选择亲属作为董事会继任者，来渗透家族主导的控制。此外，也有

某一家家庭成员在某一大学承担多个领导职务的情况（例如董事会成员与主席），并且（或者）存在不同机构由同一家族控制的情形。

挑战与弱点

在保护增强社会情感财富和家庭权力方面，家族大学面临无数的挑战和弱点。例如，家族想要维护家族影响力和主导管理决策的渴求往往不利于共享管理实践。

另一个挑战可能涉及以经济利益换得家族影响力。家族企业通常会放弃对发展业务的多元化战略的投资。企业多元化可能需要与非家族参与者分享决策权，这被认为威胁到家族的主要管理地位。

家族想要将大学掌控在自己手中，这一点也佐证了家庭优先事项可能与组织需求产生冲突。上述以家族为中心的招聘、晋升做法会导致机构冲突，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导致家庭和非家庭人员之间爆发内讧。非家族员工，特别是教师群体，可能会抵制基于家庭继承的传统和规范，尤其是在招聘和晋升中涉及到明显不合格的家族成员时。

机遇和优势

家族大学掌握了很多独特的机会和优势。在决策和组织变革等相关领域，家族主导的领导层与其他非家族管理者相比，掌握了竞争优势。通常情况下，家族大学的决策制定是一个高效、统一的过程，家族成员因一个共同的愿景而凝聚。而其他多数高等教育机构对快速变化的环境压力和需求反应缓慢，从这里看，家族大学的决策模式可能确实有利。

家族大学的另一个优势与学校领导任期较长有关。家庭成员 20 年或 30 年或更长的时间内担任重要领导职位（如总裁或董事会

成员)的情况并不少见。持续、不中断的领导使得机构战略方向保持了稳定性,这是家族大学在此方面的主要优势。

家族与大学的身份认同和声誉共命运也有益处。许多家族联盟会对他们的大学进行更多的情感和财务投资,这可能提高组织绩效,并提高家族在其所处社会中的地位。

混合型组织结构

由于上述讨论的特征双重性(duality),家族大学属于混合型组织结构。它们既是学术组织,也是保持“家族性”特征的组织。家族性可对组织活动和绩效以及组织内部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并有可能导致腐败。因个人利益挪用大学资金是许多家族大学的共同

问题。然而,这些劣势通常被一些优势所抵消,比如家族大学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情感财富、信念和优先事项等符合学术发展的需求。持有强烈教育信念和积极价值体系的家族联盟,都会带着对学术界需求的强烈敏感性进行管理和继任者培养。这些家族为全球许多家族大学的卓越声誉做出了贡献。因此,有些家族大学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榜上有名。

最终,家族大学的声誉取决于家族联盟在学校管理中所附有的价值观、历史观、信念和愿景。与非家族大学相比,家族大学的领导层深入参与学校管理,因而可以对组织文化产生更大的影响。

新《欧洲大学宪章》

塞伯特·诺尔达

塞伯特·诺尔达 (Sijbolt Noorda): 大宪章观察组织 (the Magna Charta Observatory Council)

主席

电子邮件: sjn@uva.nl、magnacharta@unibo.it

自 1988 年以来, 已有近 1000 所大学签署了《欧洲大学宪章》(Magna Charta Universitatum)。通过宪章中基本原则的陈述, 这些大学表明了学术独立和自由的重要价值。该宪章由欧洲校长理事会发起, 设立之初是为了形成国际合作和学院支持的基础。现在, 该宪章已在全球范围内享有盛誉。

自宣布宪章起, 世界上的大学以原本难以想象的方式变得紧密连接。大学数量在全球范围内激增, 从大学的类别、范围和责任来看, 亦是如此。高等教育与研究成为变革和社会转型的积极推动者的潜力持续存在。1988 年的《欧洲大学宪章》中规定的原则在如今同样适用。通过探究、分析和合理行动, 这些原则依旧是人类进步的必要先决条件。

与此同时, 大学的巨大成功引来了各种干预。在许多地方, 政治和经济权力都希望确保自己的利益。利益的确保通常是以不尊重大学自治或不尊重某些学者和学生的学术自由的方式达成。这些挑战要求全球的学术机构坚持自己的基本价值观, 并清晰明确对于 21 世纪全球各个大学至关重要的责任和承诺。

在这些挑战的背景下, 我们认为需要重新表述核心价值观、原则以及责任。这就是新《欧洲大学宪章》的初衷所在(该宪章于 2019 年起草, 2020 年定稿, 2021 年 6 月正式发布)。

价值观的价值

价值观是一个社会中关于好坏、是否可取的、大家公认的一系列重要信念或理想。价值观是个人或社会行为和态度的广泛指导方针。为什么价值观对大学很重要? 价值观对机构概况设置起到引领作用, 并帮助我们明确机构未来的发展方向。价值观体现了我们想要为谁服务、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同时, 价值观可以衡量做事的质量, 如研究操作是否诚信(没有抄袭)和教育过程的公平性。此外, 价值观至关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价值观是机构自我理解和社会定位的基本原则, 包括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社会责任和公平等。价值观的另一重要用途是在国际或国内对学术界的指导作用, 比如与谁合作、以何种方式合作、出于什么目的合作以及如何应对涵盖不同价值导向优先事项的文化多样性等。

因此, 明确、讨论和分享核心价值观对任何大学都不可小视, 特别是价值观还需考虑政治动荡、大学间竞争以及大学内部信念和观点的分歧等。理想情况下, 价值观使大学能够提高在教学、学习和研究方面的表现。如果此类价值观被确定并表达为真正共享的价值观, 就会更加凝聚大学的社会/共同体意识。此外, 价值观的表达有助于向外界展示大学为何做出某些决定的原因, 以及大学希望向毕业生灌输何种价值观。

新《欧洲大学宪章》

自第一版《欧洲大学宪章》以来, 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是独立和学术自由等关键价

价值观不是为个人私利服务的特权，而是作为有责任担当的大学的基础，希冀自己通过促进社会福祉和发展来服务社会。这就是为何新宪章在开篇就表明“大学承认他们有责任参与并应对其所处社会和全世界的期望和挑战，造福人类，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此外，“智力自主和道德自主是每所大学的标志，也是大学履行社会责任的先决条件。这种自主性需要得到政府和整个社会的承认和保护，大学本身也要大力捍卫。”

这一对自主性的肯定意味着大学与公民社会建立可靠的社会契约。这份契约充分尊重大学自治，这也是大学实现高质量学术工作，以及为当前和未来社会提供有价值服务的关键前提。除了与政府和社会建立可靠、基础的关系外，新宪章还坚决主张大学是全球学术共治网络的一部分。与当地社会和生态系统深度互动的同时，大学也将致力于应对全球挑战。

在这些问题上，新宪章更加明确和全面。1988 年的宪章将大学视为以自由、开放对话和拒绝偏狭为原则，师生交流的融汇之地。同样，在这方面，新宪章更具包容性。“大学是包容、尊重的非歧视之地。在大学，以公平和公平原则，各种思想百家争鸣，包容性独领风骚。因此，大学致力于促进涵盖招生、招聘和晋升等促进学术生活所有方面的公平公正。”

在目前的情形下，呈现或讨论新宪章的所有要素是不现实的。（如需参考，相关内容可在大宪章观察组织的网站 magna-charta.org 中搜索。）新宪章也不并非是涵盖大学所有相关问题的完整集合。与 1988 年的宪章一样，新宪章强调了起草者认为至关重要的内容。但是，新宪章的起草工作是由多元化的全球团队完成，随后的磋商过程也是全球性的。因此，新宪章反映了全球范围内的一系列关键挑战和优先事项。

明确大学的角色

新宪章的基本思想是使大学发出响亮且清晰的声音。这种声音可以被视为对我们全球范围内所有院校进行强有力的共治和支持的信号。大学通过签署 2020 年大宪章，最终承诺加强其在保护地球和促进全球健康、繁荣和启蒙方面的作用。孤掌难鸣，没有一所大学可以靠自己作出这么大的成就。只有通过以共同参与为基础的协作，才能实现这些最终目标。这正是为何发布新宪章可被视为是在邀请同行审视自己的生活 and 宪章中所述原则和价值观之间的差异程度，并且从今往后，开始更好地履行宪章中规定的责任。通过加入签署宪章的大学社区，同行们将帮助自己和其他机构提升社会地位和影响力，造福所有人。

免费高等教育：在政治浪潮中随波逐流

艾利安娜·德加亚顿

艾利安娜·德加亚顿 (Ariane de Gayardon): 荷兰特温特大学 (University of Twente) 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Studies) 博士后研究员

电子邮件: a.degayardon@utwente.nl

鉴于 2020 年发生的一切, 有关高等教育成本的辩论趋于缓和也就不足为奇了。2020 年是人类健康和经济困难重重的一年。2016~2019 年间发展起来的免学费运动已经停滞, 这一结果合乎逻辑。2020 年势必会对高等教育未来多年的发展产生不良的经济影响。然而, 2020 年也是一些国家的选举年, 因此就免费高等教育这一议题, 希望和失望纷至沓来。

美国

免学费是美国民主党初选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两位领跑者伯尼·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和伊丽莎白·沃伦 (Elizabeth Warren) 强烈支持全民免学费。2020 年, 乔·拜登 (Joe Biden) 被选为民主党候选人, 但他在学费问题上的立场则没有那么明确。拜登的政策纲领包括免除社区大学的学费, 面向低收入学生提供免费的四年大学教育。拜登的副总统竞选伙伴卡马拉·哈里斯 (Kamala Harris) 并不支持免学费。然而, 她的政策纲领包括免除四年制大学院校机构的学生贷款。作为参议员, 哈里斯共同发起了《无债务大学法案》。

新冠疫情迫使 2020 年春季学期的线下教学停摆, 学费问题从而成为了首要问题。学生们反对为在线教学支付全额学费的计划。他们认为在线课程质量较低, 收效甚微。

即使恢复线下教学, 新冠疫情导致的长期经济危机将使学费问题继续保留在政治议程上。受新冠影响, 学生的家庭经济资源减少, 因此人们将再次质疑学生能否负担四年制大学的学费, 从而大学招生模式和学生的选择将发生变化。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 拜登总统支持为家庭收入低于 125 000 美元的学生免除社区大学和四年制大学教育的学费, 以此确保低收入学生, 包括那些家庭遭到新冠疫情重创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此举是对当前教育体系的可喜改进。加上其他一些政策改进, 如扩大儿童税收抵免计划等, 拜登很可能为民主党赢得重要的政治胜利。

新西兰

尽管 2020 年是新西兰的选举年, 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措施值得赞扬, 但是新出台的免学费计划严重受挫。2017 年, 新西兰工党政府推出了“免学费”项目, 免除大一新生的学费, 并计划将这项措施在 2020 年覆盖大二学生, 2024 年覆盖大三学生。但是, 2020 年工党政治纲领中没有计划免除大二学生的学费。

工党政府立场的变化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 工党政府成功控制了新冠疫情, 确保工党在大选中赢得胜利, 因此工党极可能无需从免除学费的承诺中获得宣传收益。其次,

免除大一新生学费的评估结果令人失望，比如富裕学生享受了不相称的福利、未能提高入学率等。第三，工党用“免费”学徒计划取代了将免学费措施在大二学生中扩展实施的计划，实际是通过聚焦大专职业培训来试图帮助低收入学生群体。

免除学费的政治

德加亚顿（Gayardon）与贝纳斯科尼（Bernasconi）在《国际高等教育》第 100 期的文章中强调，在政党的选举纲领中，或现任总统在竞选中谋求连任时，免除学费运动出现的频率高于其他一切政治议题。美国和新西兰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美国选举具有争议时，免费高等教育就会出现在议程上；当政党确保选举成功时肯定时，免除学费不再是新西兰工党的政策纲领。

新西兰的案例也表明，尽管免除学费极具吸引力，但它是一项极其昂贵的政策，政党往往无法兑现其承诺。最近许多国家的例子都证实了这一点。在预算有限、缺乏政治利益驱动的情形下，智利不再将免除学费这一政策覆盖到更多学生或更多大学。同样，为减少财政赤字，加拿大安大略省停止面向低收入学生免除学费。上述案例表明，免费

高等教育的有限收益难以证明高昂成本的合理性，从而导致计划终止或政策受限。智利于 2016 年开始的免除学费运动在随后的三年中吸引了许多国家效仿，但免除学费计划的未来却充满不确定性。

免除学费的未来

就目前而言，免除学费运动前途未卜。虽然该计划是政治领导候选人的有力工具，但由新冠疫情引起的经济危机可能会使高等教育的预算严重缩减。高等教育一向不是政府的首要工作，政府在未来几年势必会将重心放在经济复苏和医疗保健上。在这种情况下，全民免学费似乎不是一项可行的政策。

然而，在疫情肆虐之际，低收入家庭受到了最严重的经济打击，因此政府有可能在时机成熟时，考虑实施有针对性的免学费政策。这也恰恰是拜登总统提出的政策：为低收入学生免除社区大学学费。在此之前，意大利、加拿大的新不伦瑞克省和日本等地已经实施了类似的政策。针对性免学费将有效利用投入高等教育的稀缺资源。未来可能证明这一政策对疫情恢复期大有裨益。

学术界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高等教育排名（研究）的矛盾状态

耶莱娜·布兰科维奇

耶莱娜·布兰科维奇 (Jelena Brankovic): 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 (Bielefeld University) 社会学系博士后研究员

电子邮件: jelena.brankovic@uni-bielefeld.de

过去几十年，各个大学排名相继问世，变得无处不在。尽管人们对排名存有争议，但是大学排名已成为公认的跨国学术界的一部分。“大学排名会永存”，许多学者、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对此深以为然。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学排名存有弊端，各方也对大学排名抨击不断，但是高等教育界的许多人士仍然认为大学排名不可避免，甚至十分必要。为何如此呢？

为什么我们相信大学排名？

要想释疑解惑，我们应更仔细地观察大学排名，研究大学排名如何与文化制度背景产生共振。首先，排名建立在公共竞争之上，有效促使各个大学将彼此视为竞争对手。大学排名与全球竞争话语之间的近乎天然的亲和性，也许是地缘政治讨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之一。此外，大学排名与高等教育负有盛名的一些“理性神话” (rationalized myths) 相契合，例如战略管理、绩效指标、问责制、透明度、国际化、卓越和影响力等。鉴于大学排名本身具有理性的光环，它们很容易作为“逻辑”工具来培育“神话”，衡量社会是否朝着“神话”前进。

同样重要的是，人们将高等教育机构想象为以哈佛大学、牛津大学为首的、具有等级制度的机构。这种想象远早于过去几十年出现的“横霸世界”的大学排名。例如，“美

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U.S. News & World News) 和上海软科各自第一次发布的排名，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大家心目中“已知”的“最好”大学。如果不是这种情况，人们对大学排名的接受可能不会如此顺利。大学排名要增强可信度，既需要将排名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又需要允许各学校在排名中有持续浮动的空间。事实上，人们总是期待每所大学都能努力提高自己的排名。

最后，大学排名连同其他绩效相关指标，如评级、基准和标准，被作为更广泛政策工具和评估工具的一部分。这也使得大学排名“穿梭”于各种情境中。造成这种现象的一种说法是历史原因。过去几十年，有志于评估自己工作和所在机构工作的学者，一直在运用这些工具进行评估。之后，大学排名才被非学术领域以更广泛的社会目的（如效率、问责制和透明度）所采用。

在这种文化和历史背景下，人们认为给大学排名理所当然也不足为奇。由于大学排名在公共话语中的“归化” (naturalization)，很多关于排名的争论都在围绕“如何”排名展开。与此同时，即使在高等教育研究中，“排名”这一概念也甚少受到严重质疑。

模糊的界限：大学排名的科学

高等教育研究与大学排名的关系一直有些模棱两可。鉴于高等教育研究与政策和实

实践的紧密联系，高等教育的大部分研究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让高等教育公平、高效、有担当等等，也就是让大学变得更好。这种明显的规范性倾向带来的一个影响是，高等教育学者经常以保护高等教育为名行事，使高等教育免受学者认为各种有害趋势的影响。由于过去几十年大学排名引用十分广泛，所以大学排名通常被视为有害趋势之一。

因此，很多关于排名的研究都含蓄或明确地批评大学排名这一现象。但矛盾的是，批评似乎比较片面：关于大学排名的学术辩论往往围绕着排名方法及其影响展开，往往会延伸到如何改进，如何开发“更好”的排名。学术研究通常对其认为主要（近乎全部）受商业利益驱动的排名者进行批判分析。由此推而广之，排名机构会受到一定的“适当”动机和行为标准的约束。

因此，这一系列研究不是将排名作为研究观测观察，而是根据排名作为政策或透明度工具的“好”或“真实”程度来评估排名。此类论证的言下之意是，如果大学排名运用了可靠的方法，衡量了重要的指标，目的不是出于商业利益，人们负责任地使用排名，那么现状会更上一层楼。虽然短期某些排名可能会被低估，但长期来看，上述做法可以进利除害，且大学排名作为评估大学实践的合理性可以得到巩固。我们对此充满期待，至少有两个原因。

首先，关于排名“如何”的争论，包括如何“完善”排名，本质上肯定了大学排名能促进高等教育。这远远超出了大学排名的使用的方法、代表的利益和使用范围。与此同时，人们视高等教育为大学组成的零和分层秩序（zero-sum stratified order），即所有大学被期望无时无刻不在持续努力超越其他大学。如今，所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排名

都将在鼓吹高等教育作为零和竞争秩序的理念，且认为这种理念是“自然”的，甚至“优于”其他可替代概念。

其次，评估大学排名的研究为排名提供了急需的科学合理性。排名机构特别热衷于确保自己排名具有“严谨的科学性”，并在科学界也被如此对待。在改进大学排名方法、扩大排名影响方面提供建议的学术出版商，可以说是将排名机构视为学术对话的合作伙伴。此类做法危险重重，即以科学可信度支持各种意识形态和政策议程存有风险。类似的风险出现在当学者成为排名委员会和评审小组的一员，或者参加排名活动或完成排名调查时。借助科学的文化权威（通过这些学术专业知识的渠道）对于排名者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他们与科学家一样，是在从事对高等教育世界中存在和不存在的事物做出真实声明的工作。

反思的重要性

上述讨论并非否定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重要性；而是恰恰相反，高等教育领域的学术研究至关重要。但是所有的批评不能等闲视之。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断审视众所周知的“大局”以及我们自己在其中的角色和地位至关重要。

实际上，我们应该首先将排名和排名者视为研究对象。与其将排名视为一种已有的高等教育现象，或将排名者视为学术事业的合作伙伴，我们可以简单将两者视为实证调查的对象。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将两者视为数据。如果我们对自已的数据颇有微词，这可能使他人质疑我们是否有正确判断的能力。如果我们期待自已的数据能发挥作用，或者无论如何都要规范自已的数据、对自已的数据抱有期望，那么我们作为学者的可信

度恐怕会受到质疑。警惕上述风险对于我们观测结论的有效性至关重要。(换言之,我们把排名和排名者视为研究对象时,需要客观对待,客观分析。)

坚持任何事物都能“永续”是一种短视思维。以史为鉴,任何事物都是在变化中的。

如“别无选择”这样众所周知的口头禅最危险的一点可能是,我们说得越多,它就越会成为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挑战人们对社会已有“事实”的理所当然,并努力揭开已有“事实”的意识形态前提,终究是我们作为学者的职责。

与中国的交流：高等教育的困境

菲利普·G·阿特巴赫、汉斯·德·威特

菲利普·G·阿特巴赫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研究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件: altbach@bc.edu

汉斯·德·威特 (Hans de Wit):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名誉教授

电子邮件: dewitj@bc.edu

时至今日, 世界与中国的学术关系是一直备受争议。中国本身的发展、新冠疫情带来的危机以及中国在疫情中的角色, 对中国与澳洲、北美和欧洲之间在研究和教学方面的学术合作提出了挑战。这些问题被世界各地媒体不断报道, 不时夸大甚至错误报道。报道中的确存在一些实际问题, 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间现在和未来的学术关系也悬而未决。

上述紧张局势通过以下几个例子可见一斑。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师生反对与北京大学共建学位项目。名为“学术自由和国际化工作组”(The Academic Freedom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Working Group)的国际倡议, 提出了一项“行为准则”, 旨在指导世界与中国的学术关系发展。一份代表学者因研究中国工作而备受限制的声援声明正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 并得到大量学者签名支持。西方媒体几乎周周报道中国高等教育政策或实践的负面影响——更不用说中国的贸易或政治新闻了。

双方交流是大势所趋

考虑到这一双重功能, 在过去 20 年发展的与中国进行交流合作, 尤其是在当前的困难时期, 对全球高等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当

然, “孤掌难鸣”——如果合作双方都提出了不可逾越的挑战或出台消极的政策并予以实施, 那么合作双方的交流就会困难重重, 甚至导致合作停止。与此同时, 在国外访学的中国学者和中国留学生对于世界其他地区针对中国出台的负面政策和做法感到备受挑战。中国学者和学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种族主义,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带来的背景下, 他们被指控为间谍, 窃取知识产权, 在合作中被不平等对待。特别是我们看到了对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人员的调查——其中一些调查被证明毫无根据。

参与学术合作的基本责任在于学术机构和个人(教授、研究人员和学生)。机构和个人的价值观、战略和利益都在其中发挥作用。学术界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理解是卓有成效的合作与交流以及学术自由的基础。同时, 也需要各方秉持透明度原则。但不幸的是, 证据显示, 政府的政策和行动阻碍了学术工作的独立运作。

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性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至关重要。中国已成为全球学术界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拥有最大的学术体系, 其科研产出占世界第二。通

过重点投入建设研究型大学，中国大学的排名有了显著提高。在国际学生流动方面，中国是最大的留学派出国（sending country），海外学习人数达 66.2 万人。中国也是留学生的主要接收国（receiving country）之一，国内有 50 万名海外留学生，他们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中国还通过孔子学院项目在“教育外交”上投入巨资，在全球开设了 500 多所孔子学院、“一带一路”倡议等项目。

世界越来越依赖中国的高等教育。一些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依赖留学生获得可观的收入，其中中国留学生占比最高。美国、加拿大、英国和其他地方的一些学术机构也依靠招收中国留学生获利。在一些国家，STEM 领域的部分研究生项目已经十分依赖于中国研究生和博士后。

近半个世纪以来，欧洲和北美的大学出于多种原因在中国进行了大量投资，比如设立分校、联合学位项目、多种合作研究中心和中国研究项目等，不胜枚举。这些举措使西方机构能够了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及其伟大文明，并且通常能够获利。这是许多国家与中国发展合作项目的主要动力。

在这一切蓬勃发展之际，西方似乎忘记了学术合作，尤其是与中国学者和中国大学的合作，然而学术合作对于双方相互理解和解决全球社会需求至关重要，正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定义提及的那样。新冠起源和疫苗开发等种种冲突反应了政治和误解如何对危机产生负面影响并导致延期处理。

交流合作中对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虽然具体的政策和做法会根据具体情况以及利益而有所不同，但以下广泛的指导方针应当在全球范围内普遍适用。

- 正如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 (Ronald

Reagan) 曾在谈到与苏联谈判时所说的那样，“信任但要证实”。与中国同行的交流合作应建立在明确规定的目标和实践的基础之上（参见《国际高等教育》第 105 期马瑞克·瓦勒斯[Marijke Wahlers] 的《面向未来的中德高等教育合作》）。

- 与此相关的是透明度的重要性——每个人和每件事都应该公开讨论并达成一致，以便所有合作伙伴了解情况和目标。
- 鼓励并推动各类留学生的招生和交流。中国中产阶级对出国留学的兴趣仍就持续不断增长，世界人民对到中国求学的兴趣亦复如是。国际学习对各方来说都是一项重大利好，不应主要以国家软实力或市场促进国际学习，而应以学术和社会相关性推动国际学习。
- 应当鼓励个人学者与机构与中国之间的科研合作，这些合作已经是全球科学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与此同时，各方都应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以防止对人员或知识产权的剥削。
- 在这些标准下，学术合作应该留给机构、学者和学生去发展，而不是由政府主导。

结语

毫无疑问，在学术关系方面，世界与中国的关系正在改变。各方都会施加巨大的压力来限制合作。尽管存在问题和挑战，但各方应尽一切努力抵制这些压力。各方需要求真务实。

我们的观点是，世界与中国的交流应该确保在每个项目或合作中保证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中国同法国、德国和英国一样，获得政府支持和赞助的合作项目也出于外交政策目，向世界传播了本国的文化和语言。事实上，中国和其他地方所呈现的趋势正朝着相反方向发展。尽管如此，在学术和科学研

究领域的合作交流符合每个人的利益，尤其是学生和学者的利益，但目前他们似乎正是这些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主要受害者。

“内卷化”冲击下的中国学术职业

查强

查强 (Qiang Zha): 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 (York University) 教育学院副教授

电子邮件: qzha@edu.yorku.ca

过去一年,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 中国学术界也遭受了重创。中国大学的学术评估工作出现了大转折。过去十年, 人们对在被科学引文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 收录的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因此, 这些期刊被认为是顶尖期刊。科研人员在这些期刊上发表不仅会为其带来奖金奖励, 还会在学术评估中得到优待, 从而获得晋升和人才计划的机会, 进而增加个人收入和研究资源。在顶级 SCI 索引期刊上发表论文, 科研人员可以获得高达 85 000 美元的奖金。因此, 中国在 SCI 索引期刊上发表的年论文数量从 2009 年的 12 万篇激增至 2019 年的 45 万篇。

但存有悖论的是, 中国科研发表的强劲生产力并没有转化为创新。中美贸易战暴露了这一点, 揭示了中国在关键技术和知识产权控制方面的严重不足。中国的重点大学被认为缺乏重大技术开发和转让。中国顶尖科学家施一公揭露了一个惊人的幕后原因: 中国的大学没有很多原创性或突破性的创新。他进一步警告说, 中国大学当前鼓励发表的做法不一定会促进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相反, 它可能会带来表面上的繁荣, 仅仅增加发表的规模和数量。因此, 中国教育部和科技部于 2020 年 2 月发布了一份政策文件, 要求不将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作为科研评价的直接标准。根据新政策, SCI 相关指标 (如 SCI 收录期刊发表文章数、期刊影响因子、

出版物引用次数) 不得作为研究价值的直接证据, 取消直接依据 SCI 论文相关指标对个人和院系的奖励。2020 年 12 月, 教育部、中央组织部、中宣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了《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 要求修改教师考核评价制度, “坚决摒弃 ‘以刊评文’, 破除论文 ‘SCI 至上’”。

2021 年 5 月 21 日, 中国深改委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意见指出了目前考核实践中存在的指标单一化、标准量化、结果功利化、盲目跟风等问题。意见要求建立一个市场评价、中长期评估和后期效应评审的多元评估体系。意见表明了改革中国科研评估机制的紧迫性。

“内卷化”难辞其咎

“内卷化”被认为是造成上述悖论的一个重要因素。“内卷化”这一概念最初被人类学家用来描述某些农业社会的人口增长与人均财富减少之间的联系。“内卷化”现在在中国部分地区愈发普遍, 这些地区的大多数人工作更加努力, 但在社会阶层跃迁方面进展甚微。当把这个概念迁移到学术职业时, “内卷化”指的是大多数大学研究人员更加努力工作并发表更多论文, 而中国高等教育的创新实力却没有显著增长的矛盾情况。这一事实生动地证明了上述悖论: 一方面, 越来越

多的中国大学因论文发表和引用升至全球大学排名前列，但另一方面，美国利用中国的技术瓶颈在贸易战中限制中国。具体而言，国际研究出版数据记录显示，中国在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化学、数学和物理等领域的论文发表数量超过美国。然而，在《中国科技日报》最近引用的 35 项关键技术限制中，大多数都与这些特定领域有关。

内卷化何以导致这种效果？人们认为资源的稀缺会使社会变得内卷化。面对特定社会所需的稀缺资源，社会可能会发展特定类型的机构，尽其所能追逐和分享稀缺资源；上述机构的演变越复杂，社会就越复杂。就中国高等教育而言，中国在过去二十年来对一些旨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点建设项目（即“211 工程”、“985 工程”和“双一流”计划）或奖励高素质人才项目（如“千人计划”、“长江学者”等）上进行了大量投入。这些项目吸引并集中了大量资源。许多省级政府效仿这种做法并在地方一级推出卓越项目。这些项目不仅集中了资源，而且还将评估标准（和权重）聚焦于高被引期刊（被 SCI 索引收录的期刊仅占有科学与工程期刊的一小部分）的论文，着实创造了一种稀缺的局面。

这种由“SCI 主义”制度驱动的稀缺状态促使中国大学和研究人員將注意力和努力集中在解决眼前的稀缺问题上，即要敏锐地抓住上述优秀项目的机会。这种情况通常会通过快速周转工作来提高生产力。有些学者甚至为了在 SCI 期刊上发表而使用有针对性的策略。

更糟糕的是，资源的稀缺阻碍了我们的认知功能和表现。稀缺性很可能将我们推入一种境地，这是一种完全关注供不应求的资源或机会的状态——通常以扩大我们思考和

想象的认知空间为代价。缺乏认知空间会抑制流体智力（fluid intelligence），反过来又会阻碍设想大问题和实现长期目标的能力，并导致只能完成中程（middle-range）而非创新性的工作。因此，稀缺性的概念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学术界如何发生内卷，更重要的是，稀缺性可以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未来的发展

上述政策措施表明，中国政府努力打破已陷入困境的知识生产内卷循环，并致力于重振创新和高影响力研究。然而，结果可能取决于或者受制于某些内部和外部条件。

从内部看，中国规模庞大，因此资源持续稀缺。例如，即使在全国排名前 100 的大学中，大学间的收入差距也可高达 30 倍。稀缺性制度（scarcity regime）是一种自然的政策选择，它已被证明在实现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方面卓有成效。可以说，稀缺性确实提供了一种专注红利（focus dividend），在这种情形下，因为专注于单一的追求，生产力会有所提高。这种聚焦红利的效果，满足了中国在全球竞争中超越他国的需要。如果替代机制不能到位并有效发挥作用，那么路径依赖带来的惯性可能会使其重走老路。事实上，虽然中国已禁止使用 SCI 相关指标，但尚未批准任何替代评估机制。

从外部看，学术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带有稀缺性制度的特征，它主张将投入重点放在顶级机构和研究人员身上，通过不断严格的选择将研究回报最大化。因此，研究人员被迫在具有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尽可能多地发表文章，从而有良好的引用表现，研究人员所在的大学在学术排名上也能从引用中受益匪浅。如果中国大学的排名结果在这种新的政策环境中受到阻碍，那么政府（以及大

学)也有可能希望重新使用旧规则。

回顾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辉煌历史

杨锐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副院长

电子邮件: yangrui@hku.hk

近几十年来,中国愈发希望自己的顶尖大学能够跻身全球排名前列。就在一个世纪前,当时中国新成立的高等教育机构已享有世界一流的全球声誉。尽管近代早期对中国整个国家而言是具灾难性的,但这恰是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黄金时期。西方的大学理念是随着实践经验不断积累而塑造起来的。与西方不同,中国人对现代大学的理念肇始早于实践积累,并且理念在清末新政(1901~1912年)期间迅速成熟。

教会学校

二十世纪初起,教会学校在中国建立并迅速达到国际水平。面对中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文化和盘根错节的知识传统,教会学校以最大的热情征服了中国文化,教会学校也成为了引进西方核心价值观和知识的渠道。1882年成立的腾州书院是中国最早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机构。到1940年代初,中国建立了13所新教学学校和三所罗马天主教学校。1901年卫理公会成立苏州大学,它被视为中国第一所完全西式的大学。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轫时期,苏州大学为美国之学“东渐”发挥了重要作用。圣约翰大学也以引进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在中国闻名。

教会学校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滥觞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影响,并在大学宗旨和理想等方面树立了中国教育模式基本维度的榜样。无论是在教会学校学习和生活的中国学

生,还是任教和管理的外国教育者,他们自身中西知识传统的文化融合程度相当高。部分教会学校随后成为著名的中国研究中心,如燕京大学、山东基督教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等。教会学校将中国传统融入原本几近西方的课程,形成了具有全球学术视野的独特教育模式。

20世纪上半叶,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已经成为国家的栋梁。由于毕业生学术卓越,因此许多教会学校享有了世界一流的盛誉,并在国际上得到认可。这些毕业生开发了许多中国最早的学术课程,如人类学、经济学、新闻学、法律和社会学等。燕京大学在1928年被加州大学的一项国际评估评为全亚洲最好的两所大学之一,使得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直接享有在美国攻读研究生的资格。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在多所学校进行了前沿研究,如南京大学的农学、山东大学的文化史、福建大学的民俗学、民间艺术和音乐以及华西联合大学的博物馆研究等领域,都能找到这些毕业生的身影。

华人创学堂

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战败,决定奋起直追。为向西方学习,中国建立了现代高等教育,这也成为重建国家的必要条件。官绅设立新式学堂,提供西方科技方面的培训。1862~1898年间,晚清改革派创办了44所新式学堂,在中国首次开设西学课

程，包括外语、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第一个新式学堂是 1862 年的京师同文馆，旨在培养面向外交和翻译人才。1866 年，同文馆增设算学、天文，教授西式科学。1902 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名京师译学馆。

另一个具有历史重要地位的是 1895 年创立的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北洋大学堂先以哈佛、耶鲁为蓝本，后以日本帝国大学为蓝本，建立了中国真正意义上全面系统学习西学的第一所现代大学。这也是中国第一所官办的、完全采用西方教育模式的大学。北洋大学堂的教育模式与今天工程师的培养方式如出一辙。其章程明确阐述了其使命、愿景和基础，展示了对大学所有基本维度的深刻理解，这是中国的第一部大学章程。

建立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机构旨在西学东渐，满足国家统一和经济进步的迫切需要，抵御气焰愈发嚣张的帝国主义威胁。新式学堂成功、全面地将西学引入中国，培养了专业人才，在各个学科研究领域开疆拓土，救国家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战火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熊熊燃烧之时，新式学堂保持住了极高的学术水准，着实令人赞叹不已。李约瑟（Joseph Needham）将浙江大学誉为“东方

剑桥”。更具传奇色彩的西南联合大学则培养了一批刚毅坚卓的跨学科大家。

以史为鉴

为应对国家面临的日益尖锐的危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机构试图将西方传统的学习与中国人的思想、知识、文化和教育特点相结合，此举极有见地。中国高校近代早期的发展中，最突出的就是努力将上述举措落地，在个人、机构、系统运作各个层面，展现了对中西教育、学术和大学运作等方面关系的管理能力。引入西方大学的概念传入中国不久，中国就在上述方面卓有成效。这些新式学堂甚至为今天中国现代高校在上述方面的实践设立了很高的标准。

由于中国近代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中国教育曾经的辉煌其实是孕育于一个军阀混战、动荡不安的时代。虽然身在乱世，但中国新式学堂为真正努力建成能够定义自治和学术自由价值观的“大学”树立了标杆。以史为鉴，现代中国可以从自己的历史中获益匪浅，尤其是要从近代早期中西教育融合中借鉴经验。

非洲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与质量保障

哈德森·关达伊

哈德森·关达伊 (Hardson Kwandayi): 津巴布韦卢帕内州立大学 (Lupane State University) 质量保障办公室主任

电子邮件: hpkwandayi@lsu.ac.zw

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 (quality assurance) 问题已成为一种全球现象。由于大众化、竞争、私有化、多种高等教育模式的出现、愈发普遍的跨国教育等因素, 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愈发严峻, 导致了高等教育标准的恶化。非洲大陆和全球已经建立相关的质量机构, 促进全球质量保向好发展。例如, 2005 年, 欧盟成员国共同制定了《欧洲高等教育区质量保障标准和指南》(ESG-QA, 以下简称《欧洲指南》)。时间推进到 2019 年, 非洲联盟制定了《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标准和指南》(ASG-QA, 以下简称《非洲指南》)。《非洲指南》是一套通用于非洲高等教育机构内部和外部质量保障的标准和指南。然而, 非洲大陆在质量保障能力有限, 导致《非洲指南》放缓实施的步伐。

高等教育研究: 质量保障标准的支柱

若想要进一步推进《非洲指南》, 高等教育管理者需要懂得高等教育研究中相关的概念和理论。这一点尤为关键, 因为《非洲指南》正是以此类概念和理论为前提。仔细分析可以看出, 13 个《非洲指南》几乎都与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中的主要课程一致, 包括领导力和管理、财务管理、教与学、课程和课程设计以及战略规划和管理。这些课程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要支柱。因此, 让高等教育管理人员接触高等教育研究, 十分重要。

由此通过正规教育或内部培训可以促进《非洲指南》的实施 (因为非洲的高等教育机构数量有限)。

在非洲接受高等教育: 机会有限

虽然对高等教育的研究可以促进《非洲指南》的实施, 但在非洲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十分有限。2014 年,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的劳拉·朗布利 (Laura Rumbley) 和同事对世界范围内提供高等教育课程的机构和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进行了研究。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 美国拥有最多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50 个), 其次是中国 (45 个)、英国 (18 个) 和日本 (11 个)。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紧随其后, 分别有 8 个、7 个和 5 个。非洲有 6 个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只占全世界的 3%。

在非洲, 只有少数大学提供从本科到博士的学位课程, 如南非的夸祖鲁·纳塔尔大学 (University of KwaZulu Natal)、开普敦大学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和乌干达的马凯雷雷大学 (Makerere University)。在非洲发展伙伴的支持下, 非洲高等教育近年来才开始越来越红火。扩展高等教育的研究范围可以大大提高管理人员在非洲大学实施质量保障的能力。

质量保障相关的高等教育课程

如下所列,许多课程在促进《非洲指南》实施方面具有很大潜力。

- **战略规划和管理:** 大多数高等教育研究课程涵盖战略规划和管理。该课程探讨了高校战略和战略决策的本质。该课程从政策环境开始,剖析了战略规划的过程;分析制度优劣、制度带来的机遇和威胁的分析;确定战略问题;制定、实施和评估战略。该课程提供了有关《非洲指南》标准一的有用背景信息,即战略、愿景和责任。这些背景信息有助于将战略目标转化为明确的战略计划和政策。对战略规划的基本理解也有助于整合战略规划和质量保障。目前,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受到深切关注。
- **课程和项目开发:** 这是与《非洲指南》标准七相关的重要质量保障领域。该标准被定义为“研究项目的设计、批准、监控和评估”。根据该标准,机构应制定引入新项目的政策和程序。人们也期望项目具有基于能力的学习成果,明确修改或淘汰项目的程序。因此,对项目设计和开发的深入理解将为根据标准七执行的质量保障标准和指南提供有用的知识和技能。通过研究高等教育研究项目中的课程和项目开发,可以更好地理解此类指南。一般的课程内容包括探索高等教育课程和规划、开发和实施相关的理论、实践和研究;教学和评估;学生学习;以及课程创新和课程变革。此外,该课程通常包括测量和评估。学生会接触到各种评估技术(包括这些技术的开发和验证)以改进教学和学习。该课程会讨论测量和评估中使用的关键术语,例如有效性、可靠性和可用性。还涵盖了测试构建、管理和评分以及项目分析的原则。
- **教学理论与实践:** 这是高等教育研究课

程中的常见课程。该课程的内容以教育理论和实践为前提,剖析各种有效的教学和学习策略。本课程的普遍内容包括:有效教学原则和教学准备;了解有效的学习方式和策略;教学方法和课程计划;微格教学法;评估策略;21 世纪的同伴教学、同伴评价教学、教学环境。了解上述方面对于有效实施《非洲指南》标准八(关于教学、学习和评估)至关重要。

- **财务管理:** 有效的财务管理是大学管理成功的基石。如果不制定具有成本效益的财务管理策略,即便一个机构可以成功调动大量的财务资源,也无法在财务上有所建树。有效的财务管理被认为是大学管理质量管理的一个关键方面。在这方面,现在应敦促大学实施国际质量保障财务管理标准,例如《非洲指南》标准四。因此,大学财务管理者必须熟悉大学财务管理的理论方面。随着成本上升、资源减少,有效、合乎道德和对社会负责的财务资源管理成为高等教育机构越来越重要的技术性工作。因此,高等教育研究的财务管理课程探讨了高等教育特有的财务问题,例如预算及其管理、资源分配、资产管理、政府拨款、财务规划和筹款。以上议题将确保财务资源的质量管理,财务管理的特点包括收入管理、内部控制、债务管理、风险管理、资产管理和采购管理方面的有效战略等。

结语

高等教育管理者,尤其是质量保障从业者,必须接受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培训,以增强自身对高等教育概念和原则的概念性理解,这对于加强高等教育机构质量保障的实

施至关重要。高等教育研究仍然是非洲教育的致命弱点，因此非洲大学亟待重视高等教育的研究。

新冠疫情如何影响非洲国家的高等教育和研究？

罗斯·詹森·范·沃伦、艾尔哈吉·奈贾伊

罗斯·詹森·范·沃伦 (Ross Jansen-van Vuuren): 《科学非洲》(Scientific African) 的编辑、
加拿大女王大学 (Queen's University) 博士后研究员

电子邮件: rdjv@queensu.ca、rossvanvuuren@gmail.com

艾尔哈吉·奈贾伊 (Alhaji N'jai): 塞拉利昂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ierra Leone) 副教授、塞
拉利昂 1808 项目 (Project 1808 Inc) 创始人及首席战略家

电子邮件: alhaji.njai@gmail.com

新冠疫情不仅夺去了无数的生命，人民安乐危在旦夕，而且严重扰乱了全球科学事业。非洲也不例外，可以说，新冠重塑了非洲的科学研究发展。

新冠疫情重塑了非洲的科学研究

非洲科学院 (the African Academy of Sciences) 已经制定了非洲的科学研究重点，能力高、资金多的机构和研究小组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例如，塞内加尔达喀尔的巴斯德研究所 (the Pasteur Institute) 推出了一个新冠快速诊断测试平台 (Diatropix)，另一些国家的研究机构正在参与由抗击新冠疫情联盟 (ANTICOV) 进行新冠疗法和疫苗的临床试验。此外，非洲国家已发表了约 1 200 篇期刊文章 (占全球论文产出的 3%)，报告了与新冠相关的科学产出 (2019-2020 年)。

然而，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新冠疫情对科学的教学、学习和研究极具破坏性。非洲中低收入国家的教职工和研究人员已经面临这些挑战。新冠疫情不仅加剧了这些挑战，而且还引入了新的挑战，暴露了各国间和各国内部科研机构之间的巨大差异。我们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索马里、南非、苏丹、乌干达和津巴布韦等国的多所大学的科学教职员工那里获得了反馈，以更好地了解新冠疫情如何影响研究、教学和学习。

数字化素养和互联网接入率低从而阻碍了在线会议和课程

与大多数西方国家一样，新冠疫情在许多非洲国家爆发预示着国家会实施一系列隔离措施，导致线下课堂和实验室关闭，许多师生返回农村家园。虽然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机构都在通过使用在线学习平台努力解决问题，但在非洲的中低收入国家，技术基础设施薄弱、互联网接入率和数字化素养低下，使得在线教学和学习对师生都极具挑战性。例如，津巴布韦总人口中，只有 33% 是互联网用户，尽管移动数据是非洲最便宜的数据之一，但通货膨胀 (2021 年 2 月通胀率达到 322%) 使成本价格本身几乎令人望而却步。相比之下，一位教师表示肯尼亚的互联网是极其便宜且易访问的，许多学生也获得了数据包的支持。然而，来自肯尼亚的其他教师 (以及一位尼日利亚教授) 认为，能否使用稳定的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处于农村和城市环境中的特定位置。令人鼓舞的是，一位南非教授提到手机和其他网络服务提供商向大学慷慨捐赠数据和设备以支持有需要的学生。总体而言，在线学习似乎使学生的学习质量以及他们参与和继续接受教育的能力下降。在某些情况下，因为学生无法支付网络费用而被拒绝访问在线课堂或被完

全退学。尼日利亚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闲散学生参与暴力政治团体的挑战。

国际合作也受到影响，因为学生无法参加国际交流项目，并且如果没有国际会议/活动或在线活动的数字化支持，网络/合作机会（学生和教职员）会受到严重阻碍。此外，由于没有面对面接触（以及上述互联网挑战），学生从导师、教职员那里得到的支持也相继变少。由于非洲文化严重依赖面对面的会议来建立个人信任，因此新冠疫情带来的变化涉及到非洲人民重大的心态转变。

实验研究的障碍

医学教育国际化对于确保未来的医生在全球对于实验科学的实际工作/研究而言，在线学习是不现实的。与全球许多大学一样，疫情之初，实验室关闭，结果导致研究（时间和实验工作/样本）的损失，实地工作也受到限制。由于科学设备和专业知识本已存在的限制，来自不同非洲国家的教师描述了他们的研究如何受到了阻碍。因为他们依赖国际资源和专业知识而无法发送样本进行测试和分析、购买研究材料或修理研究设备。此外，由于许多非洲化学品供应商进口化学品，2020 年 3 月的封锁和随后的旅行限制导致供应减少。一些供应商工厂也无限期关闭。与此同时，人们对制造洗手液和其他新冠疫情相关物质所需的化学品的需求急剧上升。甚至车载量（公共交通）减少等问题也影响了研究，因为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学生上班越来越耗时，从而减少了他们在工作线上的时间。

根据新冠疫情分配资源

许多非洲大学已经在资金和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苦苦挣扎，但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微薄的政府资金优先用于新冠疫情，而不是教育和研究。学生和教职员获得奖学金和科研经费的机会减少，现有的、定

时发放的科研经费和财务预算在没有令人满意地完成的情况下被终止。此外，随着疫情封锁的解除，非洲各国的教职员都表示需要资金来实施新冠疫情预防措施必要性，例如需要购买口罩、消毒剂、体温计，并确保有足够的洗手设施和清洁，尤其是在供水有限的国家更需如此。除此之外，还需对员工进行预防措施和在线学习方面的培训。因社交距离的要求，本已拥挤的教室和实验室的使用更为紧张，一些大学建筑甚至被作为隔离区域设施（例如在埃塞俄比亚），进一步限制了可用资源。

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也给众多非洲国家的教职工和学生带来了压力，其中许多人已经因为低工资或有限的资金支持而苦苦挣扎。再加上弱势群体在疫情中受到了更大的影响，因此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通货膨胀还增加了交通成本，使得实地考察旅行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是到农村地区；另外，正如一位乌干达教授所说，报销研究参与者的旅行费用也变得越为困难。一些教职员采取罢工行动，要求国家和学校提供更好的条件以应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但这种要求进一步挤压了研究和教学的预算。

国家背景起着重要作用

在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医疗卫生系统不到位，资源过度紧张、领导不力以及防疫信息传播不及时等因素，大大增加了疫情的风险和挑战。非洲大学已经并将继续受到这些因素的严重负面影响，包括大学社区内普遍存在的死亡和丧亲之痛（即著名教授的过世），以及教职工和学生有理由害怕感染并担忧风险和不确定性。疫情扰乱了课堂和研究，降低了学习质量，推迟了学生的毕业，可能对个人和国家造成长期不利的后果。

希望的曙光

尽管这些机构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仍有一线希望。例如，埃塞俄比亚农村地区数

字化素养低下，促使学术无国界组织与恩吉巴拉大学（Injibara University）开展合作，以培养教职工和学生的数字化素养技能。“发明之母”的必要性促进了当地主导的自我创新，例如尼日利亚医学研究所开发的测试套件（比最常用的核酸检测更便宜、更有效）。令人欣慰的是，非洲大学正在加紧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然而，国际伙伴关系对于解决危机暴露出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现象至关重要。

欧洲高等教育：回顾与展望

安德烈·苏索克

安德烈·苏索克 (Andrée Sursock): 欧洲大学协会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高级顾问

电子邮件: andree.sursock@eua.eu

自 1999 年以来, 欧洲的大学经历了极大转型, 重振旗鼓。欧洲大学的转型顺应了全球、欧洲和国家的变化, 也是国家或是大学或两者共同促成的结果。

回顾: 1998~2010 年

回顾这二十年的历程, 欧洲大学的深刻变革始于 1998 年。时任法国教育部长阿莱格雷 (Allègre) 邀请英、德、意三国同行在索邦大学 (Sorbonne University) 举行仪式, 承诺共同开启高等教育改革。随后, 其他欧洲国家争相加入。因此, 博洛尼亚进程 (Bologna Process) 的诞生是基于一个重要背景, 即全球化、知识经济、信息和通信技术、国际化、质量和创业精神等趋势愈发凸显, 这些亦被视为变革的主要因素。

在许多情况下 (或多或少), 改革是由大学校长推动, 但是大学对上述趋势的回应将自发的高等教育改革转化成各国政府引领的改革。尽管各国改革的重点和形式不尽相同, 但欧盟“现代化议程”框架内的高等教育改革有一些共同点。欧盟四大国的改革涉及质量保障、研究政策、院校自主权和财政资金。其他的变化包括高校治理改革和新的学术职业模式。

欧洲高等教育改革是在高等教育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的更广泛背景下进行的。一些国家, 特别是中欧和东欧的大学参与改革的参与率显著提高, 这与 (主要是私立) 高等教育机构数量的大幅增长相关。其他国家 (主

要但不仅限于西欧) 大学进行了合并或成立大学联盟, 以提高大学的国内和国际影响力。2003 年首次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揭示了美国高等教育整体领先于欧洲高等教育的情况, 因此欧洲高等教育改革迫在眉睫。

欧洲的第一个十年的高等教育改革规模不容小觑。许多国家的大学同时进行多项改革, 既是为了应对博洛尼亚进程带来的巨大变化, 也是为了应对高失业率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压力, 并努力提高大学的研究能力和国际影响力。

这些改革重塑了大学的内部组织。例如, 博士周期改革促进了新结构 (如博士学院) 和新流程 (导师共同指导) 的建立。建设欧洲高等教育区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和欧洲研究区 (European Research Area) 的强劲势头让大学之间、大学与私有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蓬勃发展。欧洲和各国研究资助计划不断更迭的性质, 以及对全球化的更加重视, 使得大学提供了更多、通常在学校机关层面的行政服务, 促进了行政人员专业化。大学自主权扩大提升了大学领导力, 提高了大学战略能力, 从而提高其自身形象并增强国际吸引力。60% 的受访大学将内部质控流程的提升视为最重要的内部变革, 那些最渴求国际影响力的大学尤为如此。

近期: 2011~2020 年

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肇始于 2008 年金融危机和非自由主义浪潮的阴云密布下, 大

学自主权因此受限。一些国家的人口减少导致私立高等教育萎缩，而人口老龄化对公共财政的压力愈发不可估量。欧洲一体化政策的式微和博洛尼亚进程的停滞致使欧洲各国各自为政，但是各国的政策仍旧有一些共同点：紧缩预算、增加科研人员工作量和流动性；更加重视教与学、实践技能的培养。各种融资工具开始在大学遍地开花，其中最重要的是基于绩效的融资。

金融危机的挥之不去的影响，对大学国际排名的持续关注，导致了一些国家出台“卓越计划”，对入选这些计划的大学提供了财政重点投入。

展望未来：2021~2030 年

第三个十年是在暴风骤雨中展开的。经济形势刚刚开始好转，新冠疫情就席卷了全球，世界各地人民、各个组织，包括大学、学生和教职工，都面临着一场全方位的压力测试。

然而，新冠疫情并不是唯一的改革障碍。变革受到的其他因素还包括作用越来越大的新参与者（例如，第三方教育提供者和教育科技公司），以及影响三个大学使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新趋势。比如，数字化转型及对毕业生品质（graduate attributes）和学习传递（learning delivery）机构的影响，以及体验式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短周期学位（short cycle degrees）、电子学习证书（micro-credentials）和荣誉证

书（stackable badges）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研究中的显著趋势包括开放科学（Open Science）运动；推动和抵制仅限于创新的研究；愈发重要的科技成果转化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以及转向定性研究评估的倾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环境危机促使大学思考如何通过基于挑战性教学、研究和社会参与来实现三个大学使命的有机融合。

虽然世界各地的大学都必须应对上述全球挑战，但法国总统马克龙（Macron）于 2017 年发表题为“重启欧洲”的演讲为欧洲大学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欧洲大学计划”（European University Initiative）旨在为欧洲 41 个大学联盟提供资金。该计划具备了应对上述全球挑战的能力，并能通过一以贯之的政策方法为欧洲大学注入新动力。尽管“欧洲大学计划”于近期提出，但计划通过展现更改国家规章制度从而释放战略联盟潜力的必要性，重振了逐渐式微的博洛尼亚进程。然而，该计划仅涵盖 5% 的欧洲大学与 20% 的欧洲学生（即 31 个国家/地区的 284 所大学）。大多数大学和学生仍未纳入该计划，有些国家甚至完全没有加入该计划。在一切都需要更新换代之际，切忌将一部分大学和人抛诸脑后。

注：这篇文章的完整版本发表在欧洲大学协会网站上的“专家之声”（Expert Voices series）栏目中。

法国在高等教育中更上一层楼的四种方式

弗朗西斯·威尔兰德、曼侬·盖伊特

弗朗西斯·威尔兰德 (Francis Vérillaud): 法国巴黎蒙田学院 (Institut Montaigne) 特别顾问

电子邮件: francis.verillaud@gmail.com

曼侬·盖伊特 (Manon Guyot): 法国巴黎蒙田学院品牌内容、营销和传播部负责人

电子邮件: mguyot@institutmontaigne.org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 大学面临巨大考验。法国高等教育与科研系统已经不堪重负: 资金严重不足、外来人口涌入、缺乏吸引……系统面临着重重挑战。新冠疫情的爆发使这些挑战愈显庞大。学生绝望, 职工疲惫不堪, 法国大学的气氛日趋剑拔弩张。令人唯一欣慰的是, 新冠疫情又一次引起了人们关于大学到底应该提供什么、向谁提供的辩论。这也证明了法国的高等教育与科研系统正在逐渐衰弱。

法国努力打造教育品牌的困难

法国在吸引和挽留国际学生、发表国际研究论文等方面逐步失去全球影响力。2000年, 法国在科技出版物数量上排名全球第五, 而在 2016 年, 法国的排名降至全球第八。2020 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 30 所法国大学榜上有名。就数量而言, 法国仅排在全球第 10, 排在美国 (206 所大学上榜)、中国 (144 所)、英国 (65 所) 和德国 (49 所) 之后。

这些惨淡结果表明, 法国在国际竞争中犹作困兽之斗。要想在国际上举足轻重, 法国必须增强对全世界学生和教师的吸引力。撇开薪水不谈, 他国更加优渥的工作条件足以使法国最顶尖的科研人员 (通常是最顶尖的毕业生) 离开法国, 远赴他国工作。因此,

法国人才流失的部分原因可以归咎于法国高等教育与科研长期缺乏充足的资金支持。目前, 法国经高等教育与科研的经济模式已到达濒临崩溃的临界点。

法国急需新的经济模式

法国需要增加在高等教育与科研方面的公共支出。法国应该将 GDP 的 2% 用于高等教育 (至今只占到 GDP 的 1.5%) 和 3% 用于研高等教育研究 (至今仅略高于 2%)。这将意味着高等教育的支出应达到 100 亿欧元, 研究的支出应达到 200 亿欧元。总体来看, 法国的教育和研究支出低于经合组织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之下, 德国的研究支出占该国 GDP 的 3.1%, 日本的研究支出占位 GDP 的 3.2%。

但是, 教育和科研经费不能完全依靠政府, 尤其在新冠疫情之后, 政府的公共预算更加受限。法国可以通过适度提高本科和硕士研究生 (不包括博士研究生) 的学费来增加教育和研究中的私人注资。法国的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费分别约为每学年 170 欧元和 243 欧元。相比之下, 西班牙的大学年费约为每学年 1 500 欧元, 意大利每学年 1 600 欧元, 荷兰每学年 2 000 欧元; 更不用说加拿大每学年 4 600 欧元和美国每学年高达 7 400 欧元的学费了。如果法国将学费提高至每学

年1 000欧元，这将从本质上改变法国高等教育与科研的经济模式。

学生的三幕式结构

尽管上涨幅度不大，但是毫无疑问，学生会势必将学费上涨视为无法想象的。学生会在2019~2020年期间，为270万学生提供服务。法国五分之一的大学学生，即75 000名学生，尚未完成高等教育就辍学离开学校。只有30%的学生能够在三年内获得学士学位，40%的学生则在四年内获得学士学位。这些令人咂舌的数字背后透露的是大学需要采用一种以学生为导向的新收费办法。该办法可能以一个高普及率的收入应急贷款（income contingent loans）系统为核心，既能覆盖学生的学费，还能覆盖其生活费。收入应急贷款系统旨在为所有学生提供能够支持学习的经济手段，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一般，实现法国的教育民主化。但实现教育民主化只有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才是可以接受和合理的。法国须对有真正需求的学生增加财政支持。目前约有22.2万名学生从法国社会援助计划中受益。但是这个数字只是杯水车薪。最后要注意的附加条件是：为了防止学生贷款余额失控，国家必须对高等教育与科研做出持续的承诺。法国政府可以仿照已经出台的《科研规划法（2021~2030年）》，从而通过一项多年期的高等教育规划法。

高等教育治理变革的必要性

法国的教育可以被定义为一个自成一派的教育体系。不同行政部门、大学、独立研究机构和混合研究单位之间的分散和分层格局引出了责任和治理的问题。

将法国模式与外国模式相比，可以看出

法国大学的治理模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无法自证的。法国大学的理事会（conseil d'administration）成员实际上都是由教职工和学生和教职员选出而得以任命的，但这在全球十分罕见。同样，在法国，大学校长由教职工和学生间接任命在全球也难得一见。虽然上述任命方式有一些好处，但也可能因此加剧内部矛盾或阻碍学校突破固有思维的桎梏。因此，法国大学的董事会应按照国家标准进行改革（限定成员数量，外部成员占多数）。大学校长的选拔，合乎逻辑的做法是依据个人的管理和领导能力，而不一定要从依靠教职员推举。

法国大学必须负起责任——但对谁负责？

在法国，国家和大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揭露了大学对国家的依赖程度。法国高等教育、科研与创新部（Ministère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de la Recherche et de l'Innovation）负责监督大学从招聘程序到资金的所有事务，包括授予学位等。过去15年，法国大学经历了一系列旨在对缺乏自主权或亟需提高自主权的大学的改革。给予法国大学适当的自主权将显著提高大学的绩效。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蒙田学院曾发布一份报告，列出了几条建议。法国可以从中借鉴的是：减少对大学的监督，减少对大学施加更广泛的责任。根据报告的建议，指定的资助机构将根据每所大学的项目、战略和绩效，专门负责分配资源。该机构将依靠现代化的全国研究和教育评估委员会，采用国际通用的评估方法进行评估。假设法国高等教育、科研与创新部与大学没有错综复杂的联系，那么该部门可以重新专注于战略使命，并将对学生与教师（例如，终身教职）的财

政支持工作留给大学。

结语

法国高等教育与科研改革刻不容缓。如果法国政府想真正实现对教育的积极影响，政府就需要采取行动。法国政府必须赋予大学一种新的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应该成为法国高等教育与科研发展的动力。减少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同时增加对大学的公共财政投入，法国大学才能真正发挥潜力。通过收入应急贷款系统，学生将能够在财务上脱离对于家庭的依赖，实现自主发展。

苏格兰品质：苏格兰高等教育的独特之处

尼尔·坎普、威廉·劳顿

尼尔·坎普 (Neil Kemp OBE): 国际高等教育顾问和研究员、英联邦教育委员会 (Council for Education in the Commonwealth) 董事会成员

电子邮件: neil.kemp@nkeducation.com

威廉·劳顿 (William Lawton): 高等教育顾问

电子邮件: wlawton@btinternet.com

长期以来, 苏格兰和英国其他地区的高等教育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为苏格兰议会完全掌握苏格兰教育相关的立法权。笔者在最近的一项研究《苏格兰高等教育独特优势的战略分析》(A Strategic Analysis of the Scottish Higher Education Sector's Distinctive Assets, 2021 年由英国文化协会出版) 中提出, 苏格兰与其他地区的教育差异可以视作苏格兰教育的一系列独特优势。这些优势不仅仅指大学卓越, 而且正是这些独特优势将苏格兰高等教育与其主要比较对象区分开来。本文深入探讨了苏格兰教育的优势, 提出了苏格兰教育日益增长的挑战。

教育——苏格兰的公共利益

社会利益 (societal benefit) 或者公共利益 (public good), 通常在政策制定时优先于私人利益——这是苏格兰高等教育的一个基本方面。苏格兰为集体利益立法的倾向在高等教育中有很多体现: 抵制向苏格兰和欧盟学生征收学费 (对欧盟学生的免收学费政策执行至英国脱欧); 扩大代表性不足群体的教育机会; 推动学生从两年制大学 (college) 升入大学 (university); 针对性提高大学入学普及率计划; 加强大学提供社区服务; 以及对其他教育 (包括在职培训) 的认证工作。

每所苏格兰大学每年都会更新与政府的“成果协议”, 协议中包括大学要加强社会参与的目标。

苏格兰中等的高等教育规模, 使地区内所有 19 所大学的代表能够并且真正相聚在一起商讨, 有利于发展集体主义并保持目标统一。

苏格兰高等教育独特的一面是其与苏格兰政府的关系。在英国的背景下, 苏格兰大学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要接受英国政府和苏格兰政府两个不同实体但是有所重叠的命令。因此, 苏格兰大学可以而且应该落实政府的优先事项。虽然受中央和地方政府双重管辖在世界其他地区并非闻所未闻, 但在大多数诸如此类的地区, 大学作为是国家机构的一部分运作。在苏格兰, 多方利益的碰巧重合 (或多或少) 是由于自主权赋予的。

提升学生体验

整个教育行业都致力于促进学生的学习成果, 增加学生福祉, 提高学生体验。从初次交流到成为校友的整个大学过程中, 学校质量保障的核心要义一直都是学生的利益。这种措施的核心是由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 (the UK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下属的苏格兰分局提出并在整个高等教育部门落

实的“增强主题”(Enhancement Themes)。通过这项措施,质量保障局已与大学以及作为利益相关者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建立合作关系。基于“增强主题”的举措包括解决科研学生的支持需求;改善远程学习学生的体验;并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能力。

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能力这一举措已纳入到苏格兰的学士学位课程中。高等教育部门与雇主间的合作让 95% 的苏格兰学生在毕业后的六个月内就业或接受就业培训。学生能够获得工作实习机会,参与行业前沿项目,接受大学的支持计划以帮助他们发展初创公司。大学的支持计划为苏格兰商业成功做出了贡献。例如,大学的支持计划促使新的数字技术公司扎根于邓迪——爱丁堡——格拉斯哥枢纽地区。国际学生也参与其中,并能够留在当地成为企业家。

国际国内活动相互间的良性作用

苏格兰的大学有着悠久的国际合作传统:其中四所大学已有 400 多年的合作历史。过去十年中,苏格兰所有大学的国际化活动数量急剧增长。按人均计算,苏格兰的国际学生入学人数仅次于澳大利亚。苏格兰有四所大学进入全球排名前 200 名,七所大学进入前 400 名。在人均拥有全球前 200 名大学数的排名中,苏格兰排名仅次于瑞士,排名第二。苏格兰的大学中约 36% 的学术和研究人员来自世界各地,这一比例在过去五年中显著增加。

苏格兰在国际化方面的成功是大学和政府共同努力的结果之一。苏格兰政府践行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承诺,从国际层面提升了公共利益服务意识,而这为高等教育相关方面的政策决策提供了信息。国内国际活动的动态相互关联:苏格兰对研究和教学

的资金投入有助于苏格兰提升教育的基础设施,使苏格兰的大学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并取得成功。苏格兰通过参与研究创新、项目质量提高、与企业建立业务联系、文化拓展活动、促进就业和收入增长等国际活动使整个苏格兰社会受益。苏格兰的大学一方面利用英国在国际上作为优质留学国家的声誉,另一方面提供苏格兰差异化的学习氛围,形成了独特的优势。

世界一流研究: 苏格兰受益匪浅

苏格兰的研究产出高度依赖于当地的大学。苏格兰的研究独特之处在于将卓越与协调的、全部的国家研究战略并置。苏格兰研究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这从其不俗的研究影响力就可证明,如研究人员人均的出版物数量、与国际合作者的出版物份额(超过一半)和研究人员人均的引文数量等。按人均计算,苏格兰在上述指标上的表现优于英国其他地区和大多数其他国家。苏格兰研究的外向定位使苏格兰成为多个学科的全球领导者,包括兽医、医学、地球、环境和海洋学、经济学、考古学和哲学等。苏格兰的大学在英国国家研究基金和欧盟“地平线 2020 计划”(Horizon 2020)基金的竞争中都取得了显著成功。

最近苏格兰对行业主导的跨学科“创新中心”的投入说明了苏格兰的政治文化如何影响教育的政策制定。苏格兰研究的重点领域涵盖气候变化、水产养殖,研究资助目的在于解决全球问题、提高国家经济表现和支持当地社区发展。这些创新中心体现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复杂平衡,也是对区域发展、国家公共利益和商业需求给予同等重视的尝试。

未来的挑战

苏格兰的大学财政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过去五年，苏格兰政府对大学的实际资助一直在下降。现如今，苏格兰的大学学生人均获得的政府资助少于英国其他地区。这一现象使苏格兰的付费学生（主要是国际学生）入学人数增加，以此弥补资金不足。如此以来，苏格兰的大学更容易受到英国脱欧和新冠疫情的影响。

尽管苏格兰的亲欧情绪仍然强烈，但苏格兰大学需要与英国其他地区同样承受英国脱欧带来的后果。其中包括欧盟学生入学人数下降、退出“伊拉斯谟项目”（Erasmus program）后学生交流减少、欧盟研究人员和

学术人员减少以及研究资助来源充斥着巨大不确定性。

新冠疫情对高等教育的全面影响尚未可知，但过去一年，国际学生的流动性显著下降，包括国际学生的入学人数减少、国际学生的相关收入损失等。新冠疫情也大大降低了研究人员和学者的流动性。但从更积极的方面来说，新冠疫情激发了大学的力量，展现了大学的想象力，并促使大学在教学法、教学评估和学生支持等方面进行创新。此外，苏格兰政府为研究提供紧急资助，使得大学在疫苗研发、测试研究以及向公众传播相关知识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孤独的天才还是群体的智慧：关于德国赞助独立研究机构的迷思

贾斯汀·J·W·鲍威尔、大卫·P·贝克

贾斯汀·J.W.鲍威尔 (Justin J.W. Powell): 卢森堡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Luxembourg) 教育社会学教授

电子邮件: justin.powell@uni.lu

大卫·P·贝克 (David P. Baker):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社会学、教育与人口学教授、卢森堡大学客座教授

电子邮件: dpb4@psu.edu

从顶尖期刊的文章发表数量来看, 德国仅次于美国和中国。但与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不同的是, 德国科学界在大学与独立研究院之间分化严重。德国大学都拥有相似的名誉但面临撑起资金不足的问题; 独立研究院则由精选的科学“天才”领导且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在这种大学和独立研究机构双支柱的政策方针下, 大学应该专注于培养下一代科学家, 而前沿研究却一直被认为是数百家知名、资源更充足的独立研究机构的专利。

德国的独立研究机构受到各种组织的保护, 例如, 马普学会 (Max Planck Society, 成立于 1948 年)、弗劳恩霍夫协会 (Fraunhofer Society, 成立于 1949 年)、莱布尼茨学会 (Leibniz Association, 成立于 1990 年) 和亥姆霍兹联合会 (Helmholtz Association, 成立于 2001 年), 这些协会都有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 几乎不承担教学任务。2017 年, 德国 3% 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用于研发, 德国因此实现了欧盟建议的经费目标, 经费支出率在欧盟中名列前茅。然而, 德国大学只得到了上述经费的 17%; 更多的经费流向了通常由德国联邦和州 (Länder) 政府共同资助的研究所。因此, 这种双支柱政策方针代表了一个与事实 (大学在科学生产中的相对重

要性) 相反的案例。我们在即将出版的《全球巨型科学: 大学科学化世界》(Global Mega-Science: Universities Scientize the World, 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书中讨论了这一点。

双支柱研究政策方针的迷思

尽管德国大学人均得到的赞助较少, 研究环境也不尽如人意 (更不用说随着高等教育参与率的大幅提高, 大学承担了更多的教学和培训责任), 但是德国大学的出色表现掩盖了一个迷思, 即人们认为德国几乎所有重要的科学研究都在独立研究机构进行。事实上, 德国大学才是大部分新科学和技术研究的原产地。最近, 我们对 1950 年以来、至少有一位作者为德国人的 17.6 万多篇 STEM+ 领域的期刊文章进行分析后发现, 德国独立研究机构和大学新发明产出率为 1: 3。

此外, 这个有关独立研究机构迷思的一个核心原则是减轻科研人员的教学和行政责任, 必然会使他们在科研上更有效率。然而, 这个核心原则仅能为独立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提供微弱的优势。尽管独立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生产力高于大学科研人员, 但是据估计, 独立机构的科研人员每年只能产出四分

之一篇论文。事实上，为了与其大学总的丰硕研究成果相匹配，在对独立研究机构高不可攀的经费支出上再增加三分之二投入的提议，完全不切实际。

另一个普遍的说法是，独立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将利用他们资金充足的研究环境与更为忙碌的大学同行进行合作。但是，尽管采取了多项举措，但合作的成效十分缓慢。在 2000~2010 年间，独立研究机构/大学的合著占有所有出版物的比例仅从 3% 增加到 12%。此外，这两个部门之间计划合作只有部分得以实施，例如两种组织形式共建研究生和博士课程就是如此。即使在合作时代，德国不同组织形式的科研人员间的交流也因种族隔离和巨大的声望差异受到阻碍。

也许最值得珍视的信念是独立研究机构在科学产出上超群绝伦。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通常情况下，独立科研机构中将全部精力集中在专业领域的科研人员确实发表了许多具有高影响力的论文，但大学在顶尖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是独立科研机构的两倍，并且大学经常与所有其他科学产出组织形式的研究人员合作。虽然独立研究机构拓展了科学探究的边界，并且机构作为整个科学系统的催化剂（与全球领先的科学家合作），但是大学的科研发表涵盖更广泛的主题，并通过嵌入不同的网络、教育和科学形式与独立研究机构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此外，这两种组织形式的科研人员都获得了诺贝尔奖等重大科学奖项。

从某种角度看，上述一切都不足为奇。毕竟，独立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要少得多；独立机构和大学的科研人员数量之比为 1: 6。但大学的成就是显著的，因为它们的资金没有跟随学生入学人数的大幅增长，而且大学也缺乏专门的研究基础设施。在全球

大科学（megascience）的世界中，对孤独天才模型的大量投资可能不再有意义；但对合作科研人员的团体进行投资才是关键。如果政策朝这个方向发展，德国大学可以做得更多。

然而，研究政策继续强调为独立研究机构增加资源，而对大学科研人员的投入则被降为竞争性资助计划。另外，由于德国大学几乎不收取学费，因此其很难如美国大学一样用学费来交叉补贴，支持研究。

自 1960 年代以来，尤其是过去十年，长期资金不足和不断增长的入学人数迫使德国大学将大部分分配的资金用于教学而非研究，而且教授的教学负担很重。稀缺的研究资金对于帮助维持大学基础设施和为年轻研究人员提供支持变得愈发重要。例如，几轮国家“卓越计划”（Excellence Initiative）强调了这种竞争力，但只为脱颖而出的大学提供了一定限度且具有固定期限的资金支持。相比之下，独立研究机构的预算一直在稳步提升，并且独立研究机构现在还可以参与额外研究资金的竞争。虽然独立研究机构确实为年轻科研人员提供了理想的研究条件，但大学仍然有责任提供教育课程并颁发学位证书。

“洪堡”大学模式：在国外更成功地效仿

在世界其他地区，各国纷纷争相效仿德国的“洪堡”（Humboldtian）模式，即将研究型大学的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科学上遥遥领先的美国和正在崛起的中国、韩国等国，通过将研究重点放在发展整体高等教育系统上，整体（不仅是各国少数著名大学）迅速而大规模地提高了科学能力，成功成为德国的合作者。二战后，德国对本国所有大学的

普遍支持是重建德国科学的关键。这就是“科学世纪”中新发现的、非凡且持续的纯粹指数增长背后的秘密。

现在，在全球每年发表的超过 200 万篇文章中，80~90%的文章来自大学科研人员。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德国为世界提供了研究型大学模式，但近几十年来，德国并没有支持本国大学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能力。德国应该很快通过增加整体资金

来纠正这个错误（不仅是竞争激烈、成功率适中的项目，如“卓越计划”，而是更普遍的项目）。由于世界各地的大学为各种组织形式的科研人员提供了最重要的科学交流平台，因此德国的政策也必须更有效地促进独立研究机构和大学之间的合作活动。如此一来，德国将更好地利用其庞大的研发预算，也将有助于德国在全球日益激烈的科学竞争时代保持领先地位。

STEM 领域学生的跨国学习

普拉尚特·洛亚尔卡、刘欧、伊戈尔·奇里科夫

普拉尚特·洛亚尔卡 (Prashant Loyalka): 美国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 教育研究生院副教授、弗里曼斯波利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电子邮件: loyalka@stanford.edu

刘欧 (Lydia Liu): ETS 首席研究总监

电子邮件: LLiu@ets.org

伊戈尔·奇里科夫 (Igor Chirikov):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SERU 联盟主任、高级研究员

电子邮件: chirikov@berkeley.edu

本科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简称 STEM) 教育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帮助学生获得更高水平的学术技能和更高层次的思维技能。这些技能有助于提高创新和高附加值产业的生产力。尽管全球每年投资数百亿美元, 帮助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培养学术和更高层次的思维技能, 但我们仍然对学生在本科学习期间实际获得这些技能的程度知之甚少。

为了弥补这一差距, 我们收集了中国、印度和俄罗斯 3 万多名 STEM 领域本科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学术技能 (数学和物理) 的国际标准化评估数据。这三个国家培养了全球将近一半的 STEM 领域毕业生。我们通过加入美国 STEM 领域的学生批判性思维技能水平和技能提升的信息进一步扩展了该数据集。我们发现各国之间、精英院校与非精英院校之间学生的技能水平和技能提升存在显著差异。

各国技能水平和技能提升的不同路径

大学学习伊始, 中国和美国新生的批判

性思维能力水平相近, 远高于印度和俄罗斯的新生。与俄罗斯和印度的新生相比, 中国新生的数学和物理技能水平最高。与印度的新生相比, 俄罗斯新生的批判性思维和数学技能水平明显更高, 但物理技能水平不高。

这四个国家的学生在大学期间技能提升了多少? 在批判性思维方面, 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学生在大学期间没有取得进步 (甚至退步), 而美国的学生则取得显著进步。由于技能提升的跨国差异, 中国在数学和物理技能方面的优势在两年后显著缩小。在中国, 大一开始到大二结束, 在数学和物理方面的技能增长可以忽略不计或为负。相比之下, 印度和俄罗斯的数学技能提升估值以及印度的物理技能增益估值为正且增长显著。

精英大学的学生学得更好吗?

过去二十年, 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政策制定者积极推动精英院校成为世界一流, 这导致高等教育系统日益分化为精英院校和非精英院校。精英院校的特点是投资水平和声望更高。在大多数国家, 与培养绝大多数大学生的非精英院校相比, 通常精英院校被

认为具有更高的质量。

我们观察得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家之间，精英和非精英院校的学生在批判性思维和学术技能提升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例如，中国精英院校的学生比印度和俄罗斯精英院校的学生具有更高水平的批判性思维以及数学和物理技能。值得注意的是，与印度精英院校的新生相比，中国非精英院校的新生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批判性思维技能（这一差距在大四学年缩小），与俄罗斯精英院校的新生相比，数学和物理技能水平更高（数学而非物理技能的差距在大二缩小，几近相同）。总体而言，与非精英院校相比，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精英院校都录取了技能水平较高的新生，但对提高他们的技能没有太大的贡献。

缩小技能提升中的性别差距

最后，不同性别之间的技能水平和技能提升差异很小。大学学习伊始，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女学生表现出与男学生相似的批判性思维技能水平。新生中，中国和印度女生的数学和物理成绩略低于男生。俄罗斯女生的数学和物理成绩与男新生处在同一水平。

大学的前两年里，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男女生在批判性思维方面都取得了相似的进步。大学毕业时，印度和俄罗斯的女生在批判性思维方面的得分相近，而中国女学生的得分低于男学生。与男生相比，中国、印

度和俄罗斯的女生在数学方面取得了更高的成绩，因此缩小了中国和印度的性别差距，并在大二结束时超越了俄罗斯的男生。

大学学习似乎正在缩小数学（在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和批判性思维（在印度和俄罗斯）方面的性别差距，这可能有助于 STEM 领域人才的性别平等，对提高女性地位产生影响。然而，大学伊始的数学和物理的最初性别差距表明，国家需要更多投资于提高学生中学数学和科学方面的成绩，亦或表明上述国家的 STEM 课程有吸引成绩更好的女生的空间。

呼吁提高全球 STEM 教育质量

总之，该研究为跨国和不同类型院校 STEM 领域大学生的全球竞争力提供了重要的分析。不同国家、不同类型院校间学生技能提升的巨大差异凸显了对大学技能发展进行更多研究的必要性。不同国家和不同类型院校的学生在技能发展方面的显著差异表明，高等教育系统，包括精英和非精英院校，他们都没有能为学生应对基于技能的技术变革做好准备。在努力改善 STEM 教育的过程中，大学和政策制定者不应仅仅考虑增加 STEM 毕业生的数量，还要考虑他们学习成果的质量。

注：本文改编自作者在《自然·人类行为》（Nature Human Behaviour）的文章以及基于该研究的著作。

评估学生体验

卡米尔·坎迪科·豪森

卡米尔·坎迪科·豪森 (Camille Kandiko Howson):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教育学副教授

电子邮件: c.howson@imperial.ac.uk

学生调查是循证高等教育运动的一部分。基于大学生学习体验的学生反馈起源于西方民主改善的驱动力, 各学科的期末评估是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部分。这促进了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对话, 尽管对话只会导致下一批学生 (而不是对话学生) 的进步。这种做法很快就融入了质量保证的内外部流程。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评价起源

20 世纪 90 年代, 科研人员开始开展有关教学的调查, 减少对基于研究的绩效指标的关注, 而通常国内资助计划和大学全球排名都将绩效指标纳入考量。在许多拥有全国标准化调查的国家, 例如英国和澳大利亚, 绩效指标还充当政府的透明度工具, 并能够使整个教育行业进行基准化分析测试。

最近, 在学生作为消费者的市场中, 学生调查成为了关键数据来源。学生调查刺激了机构之间的竞争, 并在营销和公关活动中发挥作用。ratemyprofessors.com 等学生调查网站的运营虽然不受机构控制, 但是可能会影响教师的试用期考核和晋升前景。

学生调查何处生?

20 世纪 80 年代由保罗·拉姆斯登 (Paul Ramsden) 开发出澳大利亚课程体验问卷 (Australian Course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 简称 CEQ)。该问卷是最早出现的大规模学生

调查之一。该问卷在消费者 (学生) 满意度方面提供了明确的依据, 考察的方面涵盖教学、目标和标准、工作量、评估和独立性等。

20 世纪 90 年代, 美国科研人员为了回应以研究和声誉为基础的排名以及相关的质量讨论, 开展了关于学生参与度的调查。这些调查侧重于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时做了什么, 以及机构如何创造支持学生成就 (student success) 的发展环境。“全国学生参与度调查” (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建成 NSSE) 旨在为机构提供可操作的数据, 重点关注学术挑战、合作、师生互动和校园环境等方面。

21 世纪初, 英国采取了更倾向消费主义的方法, 于 2005 年启动了全国学生调查 (National Student Survey, 建成 NSS), 旨在为将要进入大学的学生在选择高等教育课程时提供有用信息。该调查很快被广泛应用, 成为公共问责工具, 以及提升机构质量的工具。有点讽刺的是, 上述调查最初遭到许多学生会的抵制。

学生调查何处去?

正如所料的是, 每一项大规模的学生调查都有助于其他学生调查的发展。英国的学生调查为 CEQ 奠定基础, 这也对 NSSE 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全国标准化调查则与在世界范围内使用更广泛的个性化、以制度为基础的调查形成对比。

参与度调查侧重于制度改进、学生自我塑造以及社会人力资本和公民参与度的发展。参与度调查已在全球广泛采用，如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爱尔兰、新西兰和南非，日本、韩国和墨西哥也采取了类似的调查。参与度调查之所以产生深远影响，部分原因在于参与度调查并未广泛应用于排名。

全球化也影响了学生调查的传播。CEQ 问世后，澳大利亚采用了一段时间的参与度调查，随后在 2015 年，澳大利亚转为采取当前的学生体验调查。相比 CEQ，这种调查更加市场化。英国的 NSS 则定期接受审查（保罗·拉姆斯登主导进行了前三次审查）。NSS 多次受审的原因是调查过于官僚化，调查结果与物有所值的政府优先事项和就业结果相悖。

由于开展精确调查开支巨大、各国高等教育系统和政府优先事项迥然不同，所以关于该议题的比较研究很少。研究从而更侧重于国内、机构间、跨学科和不同学生群体的比较。学生调查作为质量保证、认证和监管系统的一部分，已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在一些国家，学生调查有助于建立绩效制度，实现课堂有效讨论。有趣的是，在英国，学生调查的权重在“国家教学卓越框”架（Teaching Excellence Framework）中被降级，而是优先考虑就业成果。

挑战和替代方案

获取学生数据获利良多。国际排名努力将教学方法涵盖在排名中，以减少排名侧重研究和声誉的批评。但事实上，教学方法很难进行国别比较，因此上述努力很难实现。《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和《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进行合作，共同制定高等教育大学排名打开美

国市场。但是上述排名需要学生完成调查，以收集充足数据进行院校排名，因此面临着重重挑战。同样，经合组织“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估”（OECD Assess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Outcomes，简称 AHELO）项目成果也未能达成国际共识（参见洛克拉 [Loukkol] 和比特保尔 [Peterbauer] 在《国际高等教育》第 104 期中的文章）。

正如学生调查的范围十分广泛一样，对学生调查的批评也是如此，批评的范围包括调查的可靠性、措施的精确性和响应率。学生调查将许多学生的意见合并成一个单一的“声音”，这是在同质化学生，形成的学生观点也是简化的、工具性的。此外，还有大量研究是有关学生评分与反馈中性别偏见和其他特征偏见的问题，此类数据用于教师试用和晋升时，问题层出不穷。

学生调查面临的挑战也促使人们常常呼吁需要别的替代方法来收集高等教育质量的数据。这些替代方法包括更多质性的、本地化的措施，采取以学生为合作伙伴等其他合作性的替代方法。学生反馈从学生对教师的形成性反馈转变为学生对自身大学生活体验的总结性评价，可能会造成学生意见决定大学有效教学的危险。

从更宏观的层面，有必要对研究进行更大程度的三角测量，以解决如对学生评分与成绩通胀之间关系的担忧。一直以来，人们长期呼吁更多使用学习分析，但学习分析在机构内部仍未标准化。更好的做法是，各国都能使用统一的学习分析。由于新冠疫情大学被迫转向使用网课，这一变化凸显了现有的学生数据之多，并展现了现有数据如何与学生学习交互。但这一做法的风险是学生的行动可能会掩盖其心中真实的想法。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完美风暴”？

威廉·洛克

威廉·洛克 (William Locke):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墨尔本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电子邮件: william.locke@unimelb.edu.au

从长期干旱到肆虐的山火、强劲的风暴、汹涌的洪水，澳大利亚一直以其极端天气事件和气候引起的自然灾害而闻名。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澳大利亚一直在抗击新冠疫情，与新西兰一起，通过封锁国门、严管国内，防疫成效显著。然而，澳大利亚的防疫措施阻止了大量国际学生入境以开启或继续在澳大利亚的大学学习。这导致了某些大学的收入大幅缩减，并加剧了大学近期历史中罕见的金融危机。另外，无动于衷的联邦政府和异常谨慎的州政府似乎为澳大利亚的大学制造了一场“完美风暴”，并对大学的运营造成了切实的冲击。一些大学拥有资源和专业知识，可以采取长期的战略措施，应对这场危机，而另一些大学似乎在为运营而苦苦挣扎。然而，由于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行业严重依赖国际学生招生，澳大利亚的几所一流大学在 2020 年出现了大量亏损。目前，一家主要评级机构已将澳大利亚教育前景调整为负面。

对国际学生的依赖

与美国和英国的体系一样，作为高度市场化的高等教育系统，澳大利亚的大学自 2002 年以来一直在扩大国际学生招生，特别是自 2017 年国内学生人数受到限制以来。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国际学生人数从 2002 年的 12.5 万人增加到 2019 年的 44 万人。在 2017~2019 年，国际学生增幅比例达 45%，

其中绝大多数国际学生来自中国（2019 年，中国留学生占澳大利亚国际学生的 38.4%）和印度（19%）。澳大利亚的国际学生约占全球国际学生总数的 8%，位居第三，仅次于英国。迄今为止，国际学生最多的是全日制在校攻读管理与商业、科学技术学科的硕士生，其中信息技术、工程和相关其他技术等学科最容易受到国际学生数量锐减的影响。国际学生比例最高的大学包括澳大利亚“八校联盟”（Group of Eight）中的几所学校，其中悉尼大学（国际学生比例为 38.2%）和学生人数稍少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学生比例为 37%）位列榜首。

澳大利亚于 2020 年 2 月禁止中国旅客入境，同年 3 月对除澳大利亚居民以外的所有国际旅客封锁国境。自政策颁布以来，国际入学人数减少 23%，其中印度新生人数下降超 80%。虽然继续在澳大利亚大学学习的国际学生“减缓了疫情的打击”，但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学习，特别是假设限制入境的防疫政策持续到 2022 年的情况下，一旦他们完成学业，国际新生的减少将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系统产生影响。在撰写本文时，已有超过 10 万名持有澳大利亚签证的国际学生签证滞留境外，努力通过线上完成他们的课程。据驻北京的澳大利亚外交官称，许多持有澳大利亚签证的中国学生正在考虑转往可以线下

学习的国家继续求学。与其他留学生主要目的国，如美国、英国等竞争对手相比，澳大利亚疫苗接种计划的缓慢推广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国际学生减少的广泛影响

2019年，教育服务是澳大利亚第三大出口商品。澳大利亚的大学收入中，国际学生学费收入高达100亿澳元(占总收入的27%)。据估计，倘若缺乏有效战略来减轻国际学生减少带来的影响，到2024年，大学收入总的损失可能高达110~180亿澳元。未来几年，国内学生人数的预期增长将不足以抵消国际学生人数减少的预期损失，因为大学入学人数减少以及政府政策将降低国内学生学费。每个大学面临的风险大小取决于自身对国际学生学费收入的依赖大小、自身根本的财务恢复能力以及目前正在制定的战略决策。除了学费收入减少外，由于新冠疫情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大学大批量转向线上、线上线下混合的教学形式导致的额外支出，以及学生经济和福利支持，这些都会导致大学面临投资损失。

2018年，澳大利亚的大学在研究上的支出为120亿澳元(占总支出的37%)，其中约60亿澳元来自自身可支配收入而非外部支持。其中，国际学生学费约占可支配收入的50%，因此，随着收入的减少，大学的研究支出预计在2020~2024年间减少60~70亿澳元。这可能会导致研究生和科研人员人数减少5000至6000名，相当于当前研究人员总数的11%。2020年，联邦政府从“研究支持计划”(Research Support Program)中一次性向大学拨款10亿澳元。此举不太可能对大学资金短缺产生有效的缓解作用。

总体而言，由于新冠疫情，澳大利亚的

大学预计已经裁减了约1.73万名员工(占总人数13万人的13%)，其中临时的、固定聘期的科研人员和初级专职行政管理人员最容易被裁员。毫无疑问，这会导致其余学者和管理人员的工作量增加，尤其是参与教学的教职工。除了教学科研并重的合同订立比例加速下降外，许多合同实际上可能变成“仅教学型”，或者至少是“教学密集型”。

新冠疫情之前，国际教育每年为澳大利亚的经济贡献超400亿澳元，其中57%(即228亿澳元)的经济贡献以商品和服务的形式来自于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例如零售和住宿等行业。据估计，如果继续封锁国境，到2021年年中，澳大利亚境内持有签证的国际学生签证人数将减少50%。这相当于每年澳大利亚在其他行业中减少约110亿澳元的支出，而联邦政府对大学的处境无动于衷，令人匪夷所思。

冷漠的政府和政策环境

封锁国境伊始时，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建议因新冠疫情面临经济困难的国际学生应当“回家”。这是新冠疫情期间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部门采取的一系列冷漠无益甚至敌对阻碍行动中的第一个。首先，大学被排除在“保就业”(Job Keeper)计划之外。“保就业”计划旨在为受新冠疫情严重影响的企业提供补贴，而该计划加剧了失业。其次，“应届毕业生就业”(Job-ready Graduates)政策的出台，减少了高等教育院校面向国内学生教学的收入。第三，多项举措旨在挑战大学在国际合作方面的自主权，包括《2020年外交关系法》(Foreign Relations Act 2020)和将《关键基建安全法案》(The Security of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ct)扩展到高等教育和研究领域。高等教育也有被卷入澳中贸易战的风险。目前，贸易战已

导致中国对澳大利亚某些商品征收关税并暂停特定商品出口。也许教育服务将是下一个澳中贸易战的牺牲品？

政变下缅甸高等教育的悲剧

玛丽·拉尔

玛丽·拉尔 (Marie Lall):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教育学院教授

电子邮件: m.lall@ucl.ac.uk

2021 年 2 月 1 日, 缅甸军方 (Tatmadaw) 发动政变, 意在阻止大选中胜出的议员上任。本文简要概述了缅甸军方政变如何影响了缅甸的高等教育及其改革。

缅甸政治现实

1962~2010 年间, 缅甸一直处于军方统治之下。2005 年前后, 缅甸开启变革之路。2008 年军方起草新宪法, 宣布 2010 年举行选举。2011 年, 登盛总统赢得选举。由此, 在他领导下的缅甸文职政府开启了全面改革的进程。改革中包含了三个优先事项: 与昂山素季 (Aung San Suu Kyi) 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 (简称“民盟”) 实现和解; 与 20 多个民族武装团体和解, 实现民族和平; 以及推行经济改革。不久登盛总统又增加了教育改革。虽然改革没有带来民主, 但是新的参与制民主确保了民盟在 2015 年缅甸全国大选中赢得多数席位, 2020 年 11 月民盟又再次在大选中胜出。缅甸宪法由军方主控, 因此确保了军方对三个关键部委的控制, 并保证议会中 25% 的席位由军方委任。人们普遍认为政变最令人惊讶的是, 即使在改革过程中, 缅甸军方仍保持其在政府中的核心作用。

高等教育改革

高等教育系列改革始于 2011~2012 年缅甸的教育部门全面审查。缅甸教育部决定逐渐开放从学术任命到课程内容都高度集中的

高等教育系统。改革包括与国外大学就联合研究和教学签署谅解备忘录, 为将被逐步授予自治权的院校编写大学章程, 加入东盟资历参考框架, 加入学生交流计划, 以及设立校长委员会等。新成立的缅甸国家高等教育与发展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要求大学高层管理者接受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的培训, 培训内容涉及如何将评估与基于学术研究的新课程开发相联系、设立伦理委员会等问题。

高等教育对政变的反应

反军事政变的抗议活动于 2021 年 2 月开始, 最初由医生、护士和政府医院的学生领导, 其中还包括缅甸的医学院。大学教职工和学生很快加入抗议活动。抗议活动领导联合不同的群体展开, 但高等教育部门主要参与公民不服从运动 (Civil Disobedience Movement), 教职工请辞, 院校关闭。公民不服从运动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一些的教员工被降职或被派往更偏远的大学。教育部发布了一份通知, 声明将拒绝向参与公民不服从运动的人提供晋升机会。教职工被要求说明他们是否支持抗议活动, 以此确定抗议活动的支持者。由于高等院校的教职工是政府雇员, 参加抗议的学者被驱逐出学校公寓。在城市, 通常驻扎在民族冲突地区的新抵达的机动师接管了校园和政府医院, 以容纳他们的士兵。缅甸政府宣布研究生和本科最后一年的教学

将于 5 月恢复，但鉴于大多数教职工拒绝工作，且大学现在是军营，目前尚不清楚这以政策将如何落实。任何其他本科教学活动都已暂停，这与 1980~1990 年代的情况类似，当时大学关闭了十多年，整整一代年轻人错过了高等教育。

尽管全国各地还有许多其他团体加入了示威游行，其中包括许多身着教育部绿旗制服的政府教师，但是学生们始终站在抗议活动的最前线。起初，抗议活动是和平的，类似于穿上华丽服装，手持幽默海报过节，但是少数海报含有侮辱缅甸军方内容。警方对参与抗议活动的越来越多的人群，也从用水枪到手榴弹和橡皮子弹进行防暴。随着轻步兵的到来，抗议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士兵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发射实弹，狙击手射杀无辜民众。截止撰写本文时，抗议者遇害人数保守估计已超过 700 人。志愿医疗队在试图帮助伤员时也成为士兵射杀的目标，许多医生因此已经躲藏起来。大多数医院及其医学院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年轻人用轮胎筑起路障，继续抗议。随着冲突升级，轮胎被前进的军队烧毁。

由总参谋长敏昂莱（Min Aung Hlaing）领导的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State Administration Council）加大了对公民不服从运动和抗议者的镇压力度。镇压措施包括每晚 8 点在电视上宣读通缉犯名单。在撰写本文时，已有 4 千余人被捕（约有 3 500 人

仍被拘留），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学者特内尔博士（Sean Turnell，昂山素季的经济顾问）。媒体报道了军方采取的酷刑。学生领袖开始躲藏，一些年轻人开始逃往边境地区，希望在那里接受民族武装组织的战斗训练。但缅甸军方也开启了 20 年来对克伦邦和克钦邦的首次空中轰炸，加剧了与地区民族武装的冲突。移动和无线互联网被切断，抗议者之间的交流愈发困难，所有非政府媒体都已正式关门，因为仍有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报道军方行动。

政变时期的教育

这不是缅甸军方第一次进行镇压抗议活动。类似的镇压曾发生于 1962 年、1988 年、1990 年和 2007 年。由于多年的关闭和学术压制，学生和更广泛的高等教育部门一直深受其害。在缅甸军方看来，高等教育并不是改革的必要部分。教育系统应该教育年轻人尊重缅甸军方及其地位。不尊重缅甸军方的人是在跟民族坚定的守护者作对。尽管最近的东盟领导人峰会呼吁缅甸军方结束暴力镇压，但僵局何时或如何结束尚未可知。显而易见的是，高等教育部门将再次耗费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元气。

注：拉尔关于缅甸和教育改革的最新著作于 2021 年出版，可在 <https://www.uclpress.co.uk/collections/contact-115936/products/139468> 下载。

新冠疫情时代日本大学的国际化

新见友纪子、太田浩、星野晶成

新见友纪子：日本东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全球学习中心高级助理教授

电子邮件：shimmi@tohoku.ac.jp

太田浩(Hiroshi Ota)：日本一桥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一桥大学“全球教育计划”(Global Education Program)教授兼主任

电子邮件：h.ota@r.hit-u.ac.jp

星野晶成(Akinari Hoshino)：日本名古屋大学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副教授

电子邮件：hoshino@iee.nagoya-u.ac.jp

过去十几年来，日本政府一直提供多项竞争性资助以促进日本大学的国际化。受资助的大学在疫情期间执行原计划相当困难。许多大学已开始使用信息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工具，以虚拟方式继续进行国际交流。日本大学面对疫情，应对措施有何特点？日本大学又如何看待自身国际交流的前景？本文探讨了入选日本“大学间交流项目”(Inter-University Exchange Project)和“超级国际化大学项目”(Top Global University Project)这两个国际化竞争性资助计划的大学所做出的努力。

近期政府资助项目

“大学间交流项目”于2011年率先启动。该项目旨在促进由日本文部科学省每年指定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双向学生交流。入选的大学将获得为期五年的资助。近年来以下国家和地区成为日本指定的交流目标：2016年为东亚和东盟，2017年为俄罗斯和印度，2018年为美国，2019年为欧盟，2020年为非洲。

日本的另一个资助项目是始于2014年的“超级国际化大学项目”，共有37所大学入选。日本政府将在为期10年内(到2023年)对这些大学予以大量的资金补助。该项

目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鼓励日本国内顶尖大学进行改革，提高日本大学的国际形象。

截至2021/22学年，共有50所大学入选上述两个项目中的一个或同时入选。其中18所大学同时入选两个项目，18所大学仅入选“超级国际化大学项目”，13所大学仅入选“大学间交流项目”。新冠疫情期间，预计这些大学将利用政府资助在国际在线交流方面做出良好的实践。没有入选的大学随后可以从实践中借鉴，提升国际形象。

大学应对新冠疫情

根据文部科学省2020年11月对50所入选大学的调查，超过90%的大学报告新冠疫情迫使学术和学生交流项目大量取消，在提升国际化方面困难重重。此外，84%的大学表示需要修改国际化战略，为后疫情时代做好准备。这也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前所未有的形势下，大多数大学开始利用信息技术继续进行线上的国际交流和学习。疫情下大学最常见的一种做法是鼓励学生参加由国外大学提供的数周短期在线课程。疫情发生前，参加短期(时长最多1个月)留学项目的学生约占日本出国留学总数的60%以上。疫情期间，参加短期留学项目的趋势愈发明显。大多数短期在线课程完全

由国外大学推出。其他课程则是由国外大学与日本大学合作开设，以迎合日本学生的特定需求，或纳入日本大学学生和海外大学学生协作学习。许多短期课程侧重于英语或其他语种的学习。

入选大学还开发了为期一到两个学期的线上活动项目。这些课程与项目是与国外合作大学开展的学生交流计划的替代方案。在线上活动项目中，日本交换生虽然足不出户，但是仍会参加国外合作大学提供的在线课程。合作大学的学生亦是如此，通过线上参加日本大学提供的在线课程。一些日本大学与国外合作大学一道，开发出用于学生线上活动的在线平台系统。比如筑波大学推出了“课程点播”（Course Jukebox）平台。截至2021年4月，该平台为八所海外合作大学的学生提供了2805门课程。此外，国际大学联盟也提供线上活动计划。不少入选的大学都是环太平洋大学联盟（Association of Pacific Rim Universities）和亚太大学交换联盟（University Mobi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等联盟的成员。这些大学为联盟成员大学提供在线课程，鼓励学生在线注册其他联盟成员大学提供的课程。

虽然许多大学一开始将信息通信技术作为疫情的应急措施，但事实上2018年入选“大学间交流项目”的大学早在疫情之前就已经与美国大学进行了“协作在线国际学习”（Collaborative Online International Learning）项目。疫情爆发后，该举措引发了关注，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促进了可持续和包容性国际学习。关西大学的全球教育创新研究所

（Institute for Innovative Global Education）利用自身资源和培训项目，向其全球网络的成员大学传播“协作在线国际学习”的方法。

前景与挑战

根据文部科学省的调查，90%入选大学表示未来将把线下线上学习相结合，开发混成国际交流项目（blended/hybrid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rograms）。除了“协作在线国际学习”计划外，当前的其他线上交流和活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对当前疫情的应急措施，也是线下国际学习的替代解决方案。国际教育工作者担心，当大范围恢复学生线下国际学习时，线上国际学习方法可能会逐渐消失。即便在疫情之后，大学也必须利用新开发的在线学习工具，为无法出国留学的更大的学生群体提供包容性的国际教育。现在反思国际教育政策和实践过度依赖线下跨境活动适逢其时。

日本大学开展在线教学和学习项目的一项挑战是确保和提高质量。考虑到日本在线学习和远程教育的历史较短，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和专业发展（professional development）对实现在线学习至关重要。此外，想要探析此类项目的优缺点并进一步改善，那么评估参加线上交流项目的学生学习成果必不可少。这些努力可使大学就后疫情时代设想一种有效的、具有包容性的国际教学方法。应对新常态要求大学发展国际化新模式，这将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声誉和吸引力产生重大影响。

印度：太多的印度理工学院，不切实际的期望

菲利普·G·阿特巴赫、艾尔多·马修斯

菲利普·G·阿特巴赫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研究教授、特聘研究员

电子邮件: altbach@bc.edu

艾尔多·马修斯 (Eldho Mathews): 高等教育研究员

电子邮件: eddie.chae@gmail.com

毫无疑问，印度理工学院 (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英文简称 IIT) 是印度高等教育皇冠上的明珠。印度理工学院这一大学体系以毕业生的质量、在技术和工程领域的一系列学术课程而闻名于世。过去十年中，印度理工学院还通过科研园区进行研究和创新。印度理工学院是在全球排名中表现相当不错的少数印度高等教育院校。但是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印度理工学院按计划进行的“体系”扩张已经超过了其维持拔尖水准的能力，体系有陷入平庸的危险。近期，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决定允许“卓越院校” (Institutions of Eminence) 类别下的部分印度理工学院在国外设立校区，这可能会进一步削弱该院校的实力。我们应重新考虑印度理工学院变化的角色和任务，以保证学校质量和办学目的能够优先满足印度本身的需求，同时也需要考虑 21 世纪的时代需求。

印度理工学院的是与不是

最早的五个印度理工学院成立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初期。四个印度理工学院建立时与外国合作：孟买分校与苏联合作，马德拉斯分校与德国合作、坎普尔分校与美国合作，德里分校与英国合作。目前，印度理工学院共有 23 所院校。1961 年成立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后，1994 年又古瓦哈提成立第

六个分校。在此之后，17 所分校相继成立，其中一些是已有院校改造升级而来的。

在印度中央政府的慷慨解囊下，印度理工学院只专注于研究技术和工程两个学科。随后印度理工学院增设了人文社科等学科，但在印度出台《2020 年国家教育政策》 (the 2020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强调印度理工学院应该更多地关注“整体和多学科教育”前，人文社科的发展相对缓慢。

印度理工学院都是小型院校，五个历史较长的印度理工学院平均的学生入学人数约为 1 万名。一些历史较短的学校规模很小，只有不到 400 名学生。历史较长的印度理工学院约有 1 000 名教职员工，而一些历史较短的印度理工学院，例如位于巴拉卡德分校和查谟分校，教职员工约有 100 名。大多数院校教授严重短缺。例如，丹巴德分校获准聘用 781 名教职员工，但截至 2021 年 1 月，丹巴德分校仅招聘了 301 名教职员工。

课程、学生和教师

印度理工学院不是大学，所有学院既没有世界其他大学所提供的广泛学科范围，也没有足够大的规模。印度理工学院从本科院校开始建设，逐渐增加了少量研究生课程，但目前有些院校现在大幅度增加研究生课程。例如，孟买分校 2019/20 学年的研究生

入学率占总入学率的 58%。印度理工学院是一贯以最高国际学术标准为要求、自身目标明确的精英院校。在我们看来，这一传统意义重大，但维持却愈发困难。

印度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如此成功并不奇怪，因为学院本身可能是世界上筛选最严苛的院校。每年约有 70 万名学生参加印度理工学院和其他几所精英院校的全国工程入学考试，其中绝大多数考生是为了争取 23 所印度理工学院的 1.6 万多个席位而来的。根据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部长的说法，印度理工学院的辍学率从 2015/16 学年的 2.25% 下降到 2019/20 年的 0.68%，直至 2020 年 2 月辍学率仍旧微乎其微，而且还在下降。

同样，印度理工学院一直都引进优质教师。大多数教师拥有名望最高的西方大学的博士学位。一流的教授之所以能被印度理工学院吸引是因为其优秀的学生质量、能与最优秀学术人才一起共事的机会以及其对投身印度发展的承诺。虽然印度理工院所提供的薪水在国际市场上并不十分优厚，但历史较长的印度理工学院拥有较为舒适的校园工作和生活条件。

但近年来，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印度理工学院未能吸引足够数量的年轻教师来填补退休教师的空缺。印度新兴的 IT 和相关行业提供了更具吸引力的薪水和激励人心的工作机会，还有许多人因被国外的大学 and 行业所吸引而离开印度。

与此同时，政府大幅扩张印度理工学院，在印度全国各地设立分校。大多数新建印度理工学院位于小城镇，如曼迪（喜马偕尔邦）、帕拉卡德（喀拉拉邦）和达瓦德（卡纳塔克邦）等。虽然在主要大都市区以外提供教育机会很重要，但精英院校很少会远离城市的便利设施。毫无疑问，会有足够数量的优秀

学生求学于印度理工学院，但是现在和将来都很难有足够多的一流教师回来新学院授课，乡村地区的学院尤为如此。乡村的学院设备和基础设施很难达到世界一流水准。因此，印度理工学院质量下降，印度理工学品牌被淡化，在所难免。这对印度来说是非常不幸的，因为印度理工学院毫无疑问是该国最知名和最有声望的学术机构。

另外，印度各地的自身需求与印度理工学院建设之间缺乏相关性，也是令人担忧之处。大多数印度理工学院和其他著名的“国家重点研究所”（Institutes of National Importance）都是“学术飞地”，与所在地区几乎没有联系。只有少数州政府通过大学、学院、学校与当地工业与公司共享知识网络，从而有效地利用了印度理工学院的驻留优势。同样，印度理工学院很少有社区服务项目。社区服务项目可以防止新建学院受阻，例如果阿的民众就拒绝在当地新建印度理工学院，导致建设进程中断。

需要做什么

虽然印度需要优秀的工程/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机构，但不一定非要是印度理工学院。围绕印度主要城市附近，建立 10~12 个“真正的”印度理工学院是行之有效的。一些新成立的学院可以更名，并提供为培养高质量的毕业生、进行良好的研究提供足够的资源。一个更小规模的印度理工学院体系需要世界一流水平的资助，配备世界一流的教职员工，其中部分需要从世界顶尖大学引进的。最近放宽招聘规则这一决定吸引了更多外国教师。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此外，印度理工学院需要关注更广泛的国际化，而不是仅仅将学院最聪慧的毕

业生送到国外和引进拥有外国博士学位的印度人。印度理工学院开设海外分校百弊丛生，但与全球最顶尖大学深入合作，聘请外籍教师，或许邀请教师作为访问学者来校，将大有裨益，有利于该校进一步打造国际品牌。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蒙纳士大学联合学院（IIT Bombay - Monash Research Academy）和昆士兰大学—印度理工学院德里研究院（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 IIT Delhi Academy of Research）都是成功合作的典范。印度理工学院还需要稳健的政策来吸引国际学生。充足和持续的资金毫无疑问是十分必要的。资金来源可以包含政府和国内外非常成功的印度理工学院毕业生举办的慈善活动等。如果印度的“学术皇冠上的宝石”黯淡无光，那人们将会引以为憾。毫无疑问，过度扩张必将积重难返。

主编：刘念才

顾问：菲利普·G·阿特巴赫（美）

副主编：王琪

编辑：吴燕

翻译：陈若曦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东川路800号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

邮编：200240

电话：021-34204458

电邮：jihe@sjtu.edu.cn

<https://soe.sjtu.edu.cn/Web/Content/76>

Editor: Nian Cai Liu

Advisor: Philip G. Altbach (USA)

Associate Editor: Qi Wang

Assistant Editor: Yan Wu

Translator: Ruoxi Chen

Address: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800 Dongchuan Road

Shanghai, 200240

China

Tel: 86-21-34204458

Email: jihe@sjtu.edu.cn

<https://soe.sjtu.edu.cn/Web/Content/76>